

# 理论与实践



LIILUN YU SHIJIAN

10

一九五八年十月

# 目录

-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 鍾 夏 ( 1 )
- 試論人民公社的性質 ..... 孙 孺 ( 5 )
-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 金应熙 ( 10 )
- 我們不需要这样的“旁証” ..... 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年級学生 沈弈鉅 ( 15 )  
——評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証”
- 右派分子罗克汀在哲学教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 ..... 麦 祥 黃春生 ( 17 )  
施蔭民 李培荣
- 学哲学的新道路和新方法 ..... 杨 樾 ( 20 )
- 江門市检察院的干部是怎样学哲学的 ..... 中共江門市委宣传部 ( 23 )
- 街坊妇女应该学哲学 ..... 江門市堤东区居民哲学小組組長 李鳳群 ( 25 )
- 南共修正主义者国家論的反动本質 ..... 王致远 ( 27 )
- 談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作风 ..... 汪德亮 ( 31 )
- 一定要繼承革命大学的光荣传统 ..... 杨友吾 ( 32 )
-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 ..... 王 琴 ( 34 )
-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一书的几个問題 ( 書評 ) ..... 何 立 ( 35 )
- 我对人民公社两个問題的認識 ( 从讀者中来 ) ..... 黃熙良 ( 38 )

## 动态

- 广州市出现理論学习高潮
- 广州區高等学校出版理論刊物
- “广东經濟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教授的資产階級学术思想

# 論 著

##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鍾 夏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明确地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說明“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設，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虽然为时不到两月，已經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农民群众把建立人民公社，叫做“更上一层楼”，其欢欣鼓舞，急不及待的心情，可以想见。而人民公社一經建立，即在發揮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性的基本建設、加速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等等方面，表现了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大的优越性，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建立人民公社运动一开始就出現的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的情势，說明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完全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五亿农民群众的要求，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們必須坚决貫徹执行这个基本方針。但要坚决貫徹执行这个基本方針，必須从当前形势发展的基本特点，从新形势中的新矛盾，从人民公社的特点和性質等方面来理解当前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 一 新形势的基本特点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农村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批判了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右傾保守思想，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形成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

农产品的高速度增長，是这个新形势的第一个基本特点。

全国夏季作物总产量达到一千零一十亿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早稻总产量达到八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估計今年全国各种粮食作物总产量可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甚至可能增長一倍。农业生产上出現的这种奇迹，在中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以某些地区或少数試驗田的产量來說，增長的速度更为惊人。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产量，比去年增長了二倍多；紧接着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和安徽省繁昌县中稻亩产四万四千三百六十七斤多的高产“卫星”之后，广东連县星子乡田北社又射出了中稻亩产六万零四百三十七斤的高产“卫星”。这些“卫星田”的增長，都在近百倍，甚至一百倍以上。

再以广东省粮食生产出現的新形势來說，春收作物共增产二十亿斤，夏收水稻增产四十一亿斤，杂粮增产六亿斤，共增产粮食六十七亿斤，比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累計增产五十五亿斤还要多十二亿斤。

全国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高速度增長的鉄的事实，彻底粉碎了“粮食增产有限論”，破除了干部和群众保守思想，証明了粮食产量不仅可以不断增長，而且可以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速度增

長。这就大大鼓起了群众的干劲，他们的思想解放了，胆子也大起来，谁都不再满足于千斤社、千斤县的称号；在“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的口号的鼓动下，广大农民群众以拼命苦战的精神，投进了夏季和秋季的农业生产，为争取高额大丰产而斗争。

农村大搞工业，是这个新形势的第二个基本特点。

今年农业生产“一马当先”的大跃进，大大地推动了我国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农业的高速度增产，一方面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一方面要求轻工业生产也来个“大跃进”，以消化农业所提供的原料和满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跃进，一方面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和开辟了市场，一方面要求重工业为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为轻工业的现代化提供装备。但是，从农业生产需要和农民生活需要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从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看来，只靠大型和中型的工业，显然不能迅速地满足这种需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遍地开花”的工业化道路，同时，为了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动力供应，农具供应和肥料供应问题，为了解决某些农产品的加工问题，为了解决农业的机械化、半机械化问题，正在坚决贯彻执行大中小同时并举，农村大搞工业的方针。

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这个新形势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土地改革运动之后不久，就开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即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转为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过程，绝大多数农民，首先是贫农和新老下中农，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初步战胜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去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两条道路问题。接着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总路线的宣传运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大跃进形势下表现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之后，生活的集体化，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他们开始感到私有制残余的累赘，增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迅速形成。

## 二 新形势中的新矛盾

新形势的基本特点表明：广大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就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创造奇迹，跃进再跃进。但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旧的过程结束了，形势就向前发展，新的过程就代替了旧的过程。新的过程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大跃进的新形势是在解决了旧的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新形势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新的矛盾解决了，形势又向前发展。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什么是新形势中的新矛盾呢？

第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措施与几十户、几百户的小规模组织的农业社之间的矛盾。

农产品的高速度增长，形成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大跃进的形势，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促进的作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又成为农产品更高额增产的动力。但是要保证农产品的高额增产，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根本改变自然面貌的农田基本建设，采取新的农业技术措施。这些显然不是一个几十户、几百户的农业社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办得到的。而且有一些农田基本建设，如大型的水利工程，综合性的平整土地规划，不但要突破社界、乡界，往往要突破县界。无论从这些建设和措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金方面，无论从土地的占有关系方面，都不是规模较小的农业社所能解决的。这个矛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已经越来越突出了。

第二，大搞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的综合经营与单纯经营农业的农业社之间的矛盾。

农村在大跃进形势下，不但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了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而且大搞工业。不但已经搞起了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如发电站、农具修配制造厂、肥料厂、农产品加工厂

等，而且大搞鋼鐵工業。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革措施和工業的發展，要求提高勞動力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要求技術力量，要求改革工具和改進操作技術，要求進行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這樣，使農民學習與掌握文化技術知識的掃盲工作、業餘中學、農業中學、紅專學校以至農業大學、工業學院等學校舉辦起來了。農村大搞工業和隨之發展起來的文教事業，使原來單純經營農業生產的農業社的組織形式不相適應，實際上也已經突破了農業社的組織形式而向着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學兵互相結合的趨勢發展了。

第三，農民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與農業社的私有制殘余之間的矛盾。

在概述新形勢的第三個基本特點的時候，我們已經說明了，在經歷了合作化的集體勞動的鍛煉，多次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教育，特別是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以及農業生產大躍進中的教育之後，農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有了極大的提高，集體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正在形成。就以農業社辦食堂所引起的農民群眾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的變化來說，由於各戶都在食堂開膳，養豬由集體經營，這樣，作為各戶種植蔬菜和飼料基地的小塊自留地，對農民來說，不但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是一種累贅，有的群眾主動要求農業社收回自留地。由於集中開膳，農民群眾的集體觀念進一步加強了。過去從單干到農業社遺留下來的私有制的“尾巴”最後割掉了，個體的小農經濟遺留下來的“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生活方式根本改變了。同時，也由於拖着這條私有制的“尾巴”，把占農村人口半數以上的婦女束縛在繁瑣的家務勞動上，更影響社員把全部勞動力投入集體的生產，不利於發揮群眾對集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充分提高勞動力的利用率。因此，當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提高了，就更急不及待地要求鏟除農業社的私有制殘余。

在大躍進的新形勢下產生的這幾個方面的新矛盾，集中地表現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關係與農業生產大躍進的生產力之間的不相適應的狀態。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性質的原理，必須正確地處理這一矛盾，使生產關係適應於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

必須指出：我國農村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關係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發展性質的規律的。從個體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到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在一九五五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時期逐步轉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生產關係的轉變，都是適應於各個時期的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產關係的轉變，都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顯示了越來越大的優越性。今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更是農業合作化的必然結果。農民群眾把從單干到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發展，叫做“登上五層樓，吃穿不用愁”。這就是他們對這一發展過程的形象化的說明。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關係發展的過程，也自始至終表現着和反映了矛盾的運動。對這一點，農民群眾也有很朴素、但很具體的說明。他們說：“互助組比單干戶好，但買不起噴霧器；初級社比互助組好，但買不起抽水機；高級社比初級社好，但買不起大卡車和拖拉機。”那末，出路何在呢？出路就是中共中央決議指出的“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 三 人民公社化是解決矛盾的最好辦法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自下而上的群眾創造和自上而下的領導號召相結合的、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運動，這個運動標誌着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的新階段。

廣大農民群眾在實踐中突出地感覺到農業社的生產關係已經不適應發展了的生產力的要求，他們從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深刻体会到“大”和“公”的巨大優越性，要求進一步向“大”和“公”發展，因此，創造了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毛主席和黨中央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原理，及時地發現了群眾的要求和創造，肯定了“人民公社好”。因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不但最適合當前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它還具有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的雛形。

我們知道，人民公社的基本特點是一“大”二“公”。所謂“大”，就是組織規模大，一個公社不是幾十戶、幾百戶，而是幾千戶、幾萬戶，真是人多地多資金足；就是經營範圍大，不僅是經營農業，而且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學兵互相結合。大的特點便於進行大規模的綜合性生產建設，便於舉辦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一切事业。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原则更加社会主义化，农业社的私有制“尾巴”割掉了，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了带有共产主义萌芽的部分生活资料供给制的原则；就是生产和生活更加集体化。“公”的特点便于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便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觉悟，便于引导农民向共产主义过渡。此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成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统一体，便于集中统一的领导。

从人民公社的特点、性质所显示出来的这些巨大优越性，说明这种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大”更“公”的、又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是解决在大跃进的形势中产生的新矛盾的最好办法。因为在大跃进新形势中产生的新矛盾，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与大跃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矛盾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之所以最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则因为它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发展，而且有利于工农业和其他生产的全面发展；不但是一个生产的组织，而且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组织；不但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好准备。因此，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必将大大地促进农村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正是这个道理，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汹涌澎湃的、不可阻挡之势。也正是这个道理，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矛盾一经解决，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我国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已经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得到解决。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并将更大的推动农村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其结果，就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自然，说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等于说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可以没有斗争，可以一帆风顺。就其性质来说，人民公社化比起农业合作化来，是一场更深刻的革命。因此，必然有一些人、特别是一部分上中农会有抵触；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地富分子，也将乘机进行破坏。问题是：人民公社化既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它的胜利前进。

## 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教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整风胜利、教学和科学研究改革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本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阵地上，真正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在八月下旬里成立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研究会，领导并组织全系教工同学进行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工作。

八月底系里掀起了大搞科学研究向国庆献礼的热潮，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研究重点之一。经过一个月的苦战，教师同学们共完成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论文71篇（约占全系完成的科学项目18%），其中批判陈寅恪学术思想论文有36篇。在这些文章中，对陈先生的政治思想，学术

观点、治学方法，都有了较详尽的批判。陈先生几本重要著作，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书，都经过各分组集体讨论后再推出人执笔写出对该书的批判，其他有些论文亦由集体创作完成。除对陈先生一些著作论文进行批判外，对陈先生在最近几年课堂教学上散播的一些资产阶级毒素，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由于陈寅恪先生在旧中国是资产阶级学历史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长期以来在国内有很大影响，通过这次批判对揭露资产阶级的科学的真相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作用。

# 試論人民公社的性質

孫 孺

大型的綜合性的人民公社的出現，象一塊强有力的磁鐵，一下子就緊緊地吸住了五億農民的心。為時不過兩月，就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這是因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能適當地解決農村中由於農業生產大躍進所產生的矛盾，能有效地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因為它使廣大的農民看到了通往久已心嚮神往的最美滿的、最幸福的共產主義生活的道路。這是我國社會在“不斷革命”過程中又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革，是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次光輝勝利，對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學說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嶄新的人民公社組織形式的出現，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問題，有待我們加以系統的研究。本文只想試就人民公社的性質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目前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按其性質來說還是屬於社會主義的。正如9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所說，人民公社運動並“不表示它已經由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轉變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階段。”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有必要先談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由初級向高級發展過程的兩個連續階段。它們不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因而就具有共同的基礎，是建立在同一的生產方式上，即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和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但由於這兩個階段的經濟的、道德的、文化的發展和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它們之間又有明顯的區別。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指出了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的原理，同時闡明了這兩個階段不同的特征。關於社會主義階段的特征，他寫道：“我們這裡所說的不是已經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由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痕迹的共產主義社會。”<sup>①</sup>談到共產主義階段的特征時，他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源泉都盡量涌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sup>②</sup>馬克思把“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兩個原則，作為區分兩個階段的主要標志。即在社會主義階段，每個人有義務盡其所能為社會勞動，並有權利按其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得報酬。而發展到共產主義階段，則每個人都有自覺地盡其所能為社會勞動，並按各人不同的需求充分滿足地得到他對物質的和文化的需要。決定這兩個原則區別的條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產品豐富的程度，以及人們道德品質、文化技術水平提高的程度。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原則來考察這兩個階段的特点，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個方面的區別：

第一、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着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即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共產主義階段則將是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是個人經濟轉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形式。由此，在社會主義階段，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還被保留着，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將不再需要而逐步消失。

第二、社會主義階段的生產力雖然由於生產關係的變革而得到解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發展，社會勞動生產率在迅速增長，但還沒有達到產品非常豐富的程度。因而它還只能採取“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共產主義階段則要求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極高度的發展和增長，能夠提供極豐富的产品，達到可以實

①、②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21頁和第23頁）。

現各取所需的程度。

第三、在社会主义阶段，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被摧毁了，但人們在思想意識上还没有完全消除資本主义遺留下来的痕迹，依然保存着一定程度的旧制度的残余。而共产主义阶段則要求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彻底肃清旧制度的残余思想。到那时，人們的劳动是完全自觉的，它已不是生活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习惯和需要。

第四、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使一切生产过程完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人們的文化、技术水平还没有普遍达到很高的程度，因而不能不还存在着工人与农民之間、城市与乡村之間、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到共产主义阶段，則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人們具有高度的文化技术水平，逐渐做到生产过程的全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最后消除工农之間、城乡之間、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

以上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之間的基本差別。

## 二

现在，我們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基本差別来考察当前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質。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使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它將有利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有利于整个国民經济的迅速发展。

第一、从生产資料的所有制来看，首先，它表现于进一步向“公有”发展。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保留下来的私有制的残余，如自留地、大块的林木果园、大的牲畜等，在公社建立以后已开始逐步轉为公社所有。有少数公社，連房屋也逐步轉为公社所有。这就使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最后残余逐步消除，进一步向公有制发展。其次，它表现于农业社的集体經济与乡級、县級的国有經济得到了密切的結合。开始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界限。由于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社合一的綜合性的組織，原有乡一級甚至县一級的国有商业机构和較小规模的工厂，已經或將要下放到公社經營管理。这些工商机构，既不是將原来的国有經济轉为公社的集体所有，也不完全和原来的国有經济的形式相同。目前公社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商业机构下放后，資金仍由上級国营商业机构撥給，人員、工資、管理費用則归公社負責，对上級国营商业机构保持代購代銷，收取手續費的关系，或者采取利潤包干的办法。不管采取那一种关系，商业利潤仍归国家所有而非公社所有。至于公社的工业，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公社自己办起来屬于公社所有的工业，它屬于公社的集体所有；一种是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下放給公社統一管理，資金仍由国家撥給，包干一定的利潤上繳給国家，它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結合的形式。但不論商业或工业，都將直接納入国家的計劃，按照国家的計劃生产和經營。这种結合實質上是意味着集体所有制已开始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但是，尽管是私有制的残余已經开始在消除，它目前还是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尽管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已經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結合，而且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已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在目前它也还是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因此，人民公社的生产資料所有制，从主要方面来看，在现阶段还是集体所有制。还須經過一个过程，才能完全轉到全民所有制。还必确須明，仅仅实现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条件，还不是进入了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还同时决定于其他一些条件。所以說：“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質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sup>①</sup>

第二、从分配原則来看，共产主义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当然，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大二公的基本特点。社大人多，資金多，土地多，便于組織更多的劳动力和統一調配使用；便于統一調劑和調配使用公共积累資金进行較多較大的基本建設；有利于实现“三并举”的方針，加速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更广泛地利用丰富的資源以发展多种經济。这样使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使社会所生产的物質資料更为丰富，进一步滿足人民的不断增長的需要。但是在目前生产力的条件下，还不可能提供非常丰富的产品，足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而，目前各地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則，基本上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虽然各地人民公社較普遍地采取了供給制和工資制（基

<sup>①</sup> 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實行部分生活資料供給制。但是,目前的供給制還只限于少數主要的生活資料,還不可能達到全部或絕大部分採取“各取所需”。而供給制部分的生活資料,目前也還受到質量和數量上的較低水平的限制。同時,從整個公社的預算來看,在計劃社員所得(包括供給制和工資制兩部分)的分配時,是受本公社的總收入所制約的。只能按公社總的勞動所得來進行統籌分配,還不可能從滿足社員的需要出發來考慮分配。再從全社會來看,由於各公社的收入歸各公社所得和支配,還不可能由全社會來調整,這樣,不論是供給制或工資制,各公社之間的社員所得還是不平衡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還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

第三、人民公社的建立,無疑地是大大地改進了人與人之間在勞動生產中的關係。由於工農商學兵相結合,進一步貫徹了“三并舉”的方針,就開始了縮小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差別的過程。又由於公社現在已普遍辦教育,提倡科學研究,人人學哲學,學理論,學技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界限也將開始趨於消失。托兒所、公共食堂建立後,使占農村人口一半的婦女從狹隘的家務中解放出來從事社會勞動,開始逐步消除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使婦女處於不平等地位的家長制。然而,這些都還只是逐漸消滅過程的開始,在目前,這些差別依然存在。

由於上述各方面的條件所決定,所以說,人民公社的組織,在現階段仍然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它又包含了共產主義因素的萌芽,有利於積極地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

###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逐漸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一開始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同時就必然要向它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成長,它們之間沒有什麼相隔着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向共產主義逐步成長的過程。隨着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加快,這個過渡也將隨之而加快前進,因而就有可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共產主義因素的萌芽。我國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思想指導之下,從革命的實踐中証明了這一原理。

人民公社建立後,使我國農村中的生產關係,人們的思想意識,精神面貌,文化技術水平各方面都發生着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意味着人民公社是我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良好組織形式,它將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摸索出一條具體的途徑。有人發生疑問:在我國目前的生產水平還較低的條件下,就把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是否為時過早?會發生這樣疑問的原因,首先就因為他們沒有了解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逐漸發生的道理,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建立在同一基礎上并緊密銜接着的兩個發展階段截然劃分開來,沒有了解到共產主義的因素是必然要在社會主義階段中萌芽和逐漸茁壯,逐步過渡,從“按勞取酬”過渡到“各取所需”。事實上也不能設想在有朝一日來一個宣布,便同時實現所有生活資料改為“各取所需”,而是逐漸的,隨着某些部門中生產發展的程度而定。它首先將是從產量最先豐富起來的,全體人民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開始。其次,他們忽略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對於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的促進作用。只看到物質條件,看不到思想意識的作用,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通過廣泛的深刻的共產主義教育,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提高了,共產主義最高尚的道德品質普遍成為社會的風氣。這一共產主義思想的覺悟、道德的提高,就促使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產主義因素的萌芽和成長。這些,從我國人民的實踐——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充分得到了証明。

人民公社組織中的共產主義的萌芽,表現在那些方面呢?從下面幾方面可以看到:

第一、人民公社雖然在目前主要還是集體所有制,但它已開始起着變化。由於自留地、大塊的林木果園、牲口轉為公社所有,私有制的最後殘余開始在消除;又由於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密切結合,某些方面開始沖破了社會主義兩種所有制之間的界綫;人民公社的生產資料雖然屬公社的集體所有,但是許多地方已經出現廣大的農民群眾打破了社界,甚至打破了縣界省界,自帶工具,自帶糧食去支援別社、別縣、別省的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大協作,自願自覺地調配了生產資料、勞動力的使用,打破了公社集體所有的界綫。這樣,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實質上就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另一方面,隨着縣聯社的建立,社會進一步打破基層公社的界限,在全縣的範圍內,統一調劑和調配使用公共積累資金,這樣,和國家控

資就沒有多大區別，它在實質上已經是全民所有制。所有這些，都說明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已向全民所有制大大跨進了一步。而且開始向全民所有制過渡，轉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正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

第二、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則，目前雖然還是“按勞取酬”，但是在某些部分已突破了“按勞取酬”的框子。如本文上面已經提到的，許多公社實行的糧食供給制或伙食供給制，條件好的還打算實行吃飯、穿衣、教育、醫病、生育、埋葬、理髮……等供給制。這一部分已經不是按每個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分配，而是按人口來分配，初步出現了“各取所需”的形式。由於這樣，社員按勞動拿到的工資報酬，也已經不是完全按其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取得，它比完全“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些都是最明顯的共產主義因素的萌芽。

第三、人民公社目前雖然還沒有最後消除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但是由於它是綜合性的組織形式，又有一大二公的特點，它既發展農業又發展工業，既發展生產又大搞文化事業和科學研究，既搞商業又搞信用事業。公社的社員將做到下田是農，進廠是工，進店是商，入課堂是學生，拿起槍杆是兵；使“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這就是將來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界限的具體途徑。因此，工農商學兵合一，不僅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形式，而且也是共產主義的萌芽。

第四、在上述這些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人們的思想意識、精神面貌已起着重大的變化。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痕跡正在逐步消除，嶄新的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質正在滋長。無數的事例說明，“我為人人”、“拼命勞動，不計報酬”的高尚品質，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普遍發揚。由此就出現了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新的平等友愛的關係——互相協作，互相幫助，互相促進。人們思想意識的這種變化，是最可寶貴的共產主義因素，它將反過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早日完成，促進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第五、人民公社實行鄉社合一，成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的統一體，使政權機構與經濟機構結合起來，這就使社會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起了重大的改變。使政權機構同時成為直接管理經濟的機構。隨着社會發展，國內階級徹底消滅，作為政權的職能就將逐漸消失，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對人的管理將被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指導代替。”那時，政權的職能，只是對外來的階級敵人發生作用。所以，它不僅是今天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形式，也是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同時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因此，也就包含有共產主義的萌芽。

所有上述這些經濟上的、意識形態上的共產主義因素，今天雖然還在萌芽，但它具有無窮的生命力，將隨着人民公社的發展而發育茁壯，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培養這些萌芽，使共產主義的因素不斷增長，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準備條件。共產主義在我国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 四

明確人民公社在現階段的性質是屬於社會主義，又認識它同時包含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將積極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對办好人民公社有重要的意義。要正確制訂人民公社的各項基本政策、方針和措施，就必須先明確它的性質。這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所指示的：“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着本身的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如果我們看見人民公社建立後，使農村生產關係起了重大的改變，看見人民公社中某些共產主義的萌芽，就認為目前人民公社已經是屬於共產主義性質。那末我們在處理各項政策時就可能採取急躁、輕率的措施，如過急地要求一律立即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不根據各公社的具體條件，輕率地追求過多的供給制。想一下子就由“按勞取酬”改為“各取所需”，等等。這些做法，可能在各方面產生不利的影響：或是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或是使還沒有鞏固的公社組織陷於被動。更重要的是可能忽視了現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同時，將現階段

的人民公社說成就是共产主义，就会使广大农民对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发生怀疑和誤解。例如已經有一些人（当然是极少数），由于人民公社中共产主义萌芽的出现，就認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性質，因而对我们党所制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发生了怀疑，說是这个总路綫已經过时了，应当制定一个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路綫来代替它了。又有一些人認为，我国农民过去很穷苦，生活水平低，目前人民公社条件下所实行的衣、食、住方面的供給制，比起过去已有天堂地獄之分，就是过的共产主义生活，应当滿足了。这些看法，对我国当前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不会有好处。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看到人民公社目前的社会主义性質，不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它，看不见人民公社建立后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不仅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質的提高；看不见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萌芽和不断增長的趋势；看不见广大群众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空前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深刻改变。那就会犯右傾的錯誤，就会被中国人民伟大的现实生活远远地抛在后面。因为思想被束縛住，对于群众自觉自愿开始实行起来的生产资料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趋向，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試驗，就不敢給以肯定和加以引导，不善于培育各方面的共产主义萌芽。同时，对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的提高，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影响不能作应有的估計，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阻碍着群众思想的彻底解放。这样，当然更看不见人民公社將是我們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也不可能理解人民公社將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單位，这就有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的危險。

只有正确地認識当前人民公社的性質，才能貫徹党中央決議中所指出的：“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設，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和“建立人民公社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經不是什么遙远將来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①

1958年10月1日

① 見“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 广州市出现理論学习高潮

一个规模浩大的、全党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已在广州市初步形成。截至十月十一日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参加这一学习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街坊妇女已达二十万人，并涌现了中一烟厂、五金器材中心店、三元里人民公社、党校理論研究班、財政局、沙面复兴小学、云桂大街小学、詩書街家庭妇女学习小組等許多优良学习小組，取得了較为成功的經驗，大家的学习情緒很高。

广州市的理論学习一般都能联系实际，紧密結合生产和工作，貫徹实践——理論——实践的原則。党委領導，政治挂帅，是理論学习能够迅速开展的关键。广州市委和各区党委、各机关党委都大力支持群众学习理論，做好学习理論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妥善安排学习时间，組織紅專学校及学习小組，通过鳴放克服对理論学习的神秘观念，糾正学习中的一些偏向。广州市中区目前参加学习的已达五万多人，全区党员都参加了区党校学习，带动了全区全民的理論学习。該区区委

还經常检查督促，及时召开现场會議，交流学习經驗，全区按行业建立教研組，每个学习小組建立核心，实行层层領導，层层培养学习輔導力量。广州市河南区依靠各学习單位自己培养学习輔導力量；并举办学习輔導班，帮助各單位培养学习輔導員。广州市郊三元里党支部負責組織学习，从开展大鳴大放，談思想，摆情况入手，結合紅專学校的教育，因而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半个月內，使参加学习的农民由百余人增加到六万二千多人。

目前，广州市的机关干部的学习落后于工农群众，有些單位未能把理論学习和生产、工作紧密結合起来，过份強調工作忙，以致妨碍理論学习的开展。中共广州市委为了解决这一問題，于十月十一日在广州市公安局召开了一次现场會議，介紹和推广公安局結合工作学习理論又推动工作的經驗。預料到十一月間，广州市將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学习，并將开展評比竞赛，在原有基础上把学习提高一步。

#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金应熙

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儺生。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儺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儺生的谬论。本文试从这方

面提出一些意见。

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各种社会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形成的根源。而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体系中，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决定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力量。陈先生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他在分析史实时，一般多把历史归结为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他不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来探求古文运动兴盛的原因，而将古文运动的兴起归因于唐德宗这个封建君主的个人爱好：“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元白诗笺证稿，页2）这不待说是片面的、错误的。在另外一些场合中，陈先生则过分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地理环境等因素，将它代替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例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唐太宗进攻高丽失败的原因，即夸大了气候条件的作用，认为隋唐武力中心在西北，进攻高丽军运困难，必须在一年中三月至七月即寒冷期已过而雨季来临的短期中获得全胜，才能成功，隋炀帝、唐太宗进攻高丽的失败，都由于未能克服这个困难。陈先生并且企图抓住这一条纲来说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收利钝所以然之故。”这一论述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杨广和李世民侵犯高丽的相继失败，首先是由于他们进行了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高丽人民在两次战役中都表现了为争取独立自主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所以才能击退强敌。如果

不从战争的性質和作战两方的情况来作具体的分析，那就如陈先生那样不能不歪曲历史事实了。这种强调地理环境作用的历史观，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变相。这从述論稿中关于隋唐内重外輕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来。陈先生原来想突出說明所謂“关中本位政策”造成了内重外輕的形勢及其作用，但接下去就說：“……隋煬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把隋唐朝代的更迭决定于杨广个人。假如当时杨广不作南游而留守关中或东都，能不能說，农民战争的火焰烧得再猛烈些，隋的封建統治也可不致灭亡呢？陈先生那样的論断，其实是忽視物質資料生产方式的作用所得出来的。

陈先生在論述武則天与佛教、魏晉清談思想的若干論文中提出了宗教和哲学都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观点。曾有些人引証这些論文为陈先生辯护，認为他在这里自发地接近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我們認为，这种意見是錯誤的，有害的。其所以有害，即如上所述，它迷惑了一部分人的視听，使人感觉到只要鑽研史料功夫深，无須学习馬克思主义也可以自发地具有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对陈先生也沒有什么好处，使陈先生对自己的治学态度加深了自信，以为自己可以不需要思想改造了。所以，今年中大历史系鳴放时有个同学出大字报要陈先生多学习和运用馬克思主义，陈先生就答复說：“請你讀一下我的‘武墨与佛教’吧！”（大意）其实，陈先生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看法，也是和馬克思主义对立的。他不从經濟基础的改变中去說明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原因，却从某些人物（如封建士大夫）的头脑活动中去找寻这些发展的泉源。讀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决不能明了隋唐制度究竟如何变化和为什么变化，而只见到文化、制度随着某些封建士大夫家族及个人的来去而轉移。例如他不能从北魏社会跃进到封建社会后皇室与豪强矛盾尖銳化来解释三長制的建立，而只是强调李冲个人“用夏变夷”的作用。这說明陈先生並沒有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問題上自发地接近了唯物主义。我們并不否認，陈先生通过辛勤劳动掌握了政治与文化間互相联系的某些片断材料，但那与自发的唯物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絕對不能混淆。

另外有人还認为陈先生是“实事求是”，尊重証据的，这就是唯物主义。这种論調也是錯誤的。右派分子赵儷生就曾吹嘘过陈先生不抹杀反証，而是从反証的攻倒中来建立自己的論点，說这值得現

代史学界学习。事实上陈寅恪史学方法和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有根本的分歧。毛主席教导我們，实事求是就是要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亦即规律性。正是当我们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紛紜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且按照客观规律來說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时，才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門科学。陈先生則認为历史是“团团轉”的：“时尚变迁、回环往复，此古今不殊之通則。”（元白詩箋証稿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条）在这样的“通則”下，当然沒有任何历史发展规律可言了。否認社会发展规律，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呢？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有那一点共同之处呢？那只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罢了。

至于尊重証据一点，我們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陈先生在对历史真实的認識可能性上，存有怀疑，而主张乞憐于一种“直觉”。他說：

“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必須备艺术家欣賞古代繪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及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說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論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得失，而无隔閡肤廓之病。”（見馮友蘭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

在这种認为要真了解历史必須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当然談不上真正的尊重証据。

陈先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个别事实的考証的。他的史学方法的特点之一，是企图在錯綜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一些他認为重要的环节，先行解决，然后再以所得的結論为出发点，連帶說明一系列的其他問題。这种方法使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帶有一种系統性，而和其他一些專搞考据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陈先生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来認識历史，因而对所抓的环节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时常不免流于主观的臆断。要在这些主观臆測的基础上建立系統，当然十分勉强，結果在处理証据方面就不免多取有利的証据，而于反証則往往不愿顧及。这是与陈先生力求講严的初衷适相刺謬的。例如陈先生認为北魏的制度有来自河西的一源，都城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研究北魏太和年間洛阳建筑时，开头就說：“若依寅恪前所持文化淵源之說，則太和洛阳新都之制度必与……河西……有关无疑。”这是从自己的假定出发

(淵源略論稿45頁)。下文为了証实这一假定，迂回求証，力图証明洛阳的建筑是以河西姑臧城为蓝本的。但始終无法得到有力的論証，而对于若干于己不利的情况，亦置之不顧（例如陈先生強調前汉長安建筑系按照周礼“面朝背市”的規定的，但他忽略了長安市和周礼原文上一句“左祖右社”則是不相符合的。其实長安也是随着形势而发展建筑起来的，並沒有严格按照規定的制度。陈先生对这点沒有注意到）。假如陈先生抛弃自己的假定，則洛阳新都的建筑本来是容易解釋的。因为从邙山在北、洛水居南的形势看来，不論从政治上居高临下便于控制或从經濟上便于交通运输而言，統治者都是以宫城在北、市场在南較为适当。这一个例子說明，从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認識論出发，也必然陷入“大胆假設，小心求証”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論，这当然和馬克思主义尊重証据的态度根本不同的。

## 二

其次，我們要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和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方法有着根本的分歧。

这个根本分歧，突出地表现为对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陈先生和我們的看法完全对立。

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必須从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历史发展不是旧东西的重复，而是“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产生的过程。新东西是在旧东西内部萌芽的，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发展是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陈先生表面上也不得不承認历史上有变化和发展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和一切形而上学者一样，归根究底是在否定历史的前进和发展的。

首先，陈先生在研究他所謂历史“演进”时，很不重視以至根本抹煞广大人民劳动生产和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却极力夸大各个民族的接触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看来，沒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則本国文化的“演进”就很难想象；甚至微小如一种裝束，也非在外国文化影响下不能有新的时尚：“凡所謂摩登之妝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則而不須詳証者。”（元白詩箋証稿第五章新乐府时世妝条）同时，陈先生心目中也沒有什么劳动人民創造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白諸公之所謂华夷之分，实不过古今之別，但認輸入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裝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貨耳。今世修談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識，适与相类，可慨也。”（同上，法曲条）这真是奇怪、武

断的邏輯！难道中国人民就連一种新的服裝都不能創造嗎？难道扁鵲、仓公、张机、华佗这許多古代著名医药家都只是“輸入”、“舶来”的医药技术而沒有自己的独立創造嗎？

陈先生一方面鄙薄本国劳动人民的創造能力，另一方面却对于封建社会的伦常礼教，竭力維護，說成为不可变动的。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他的史学观点中的重要一条，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过。这本是清末张之洞的主张。陈先生也承認张之洞对他的影响，說：“寅恪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乡南皮之間。”（馮友蘭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我們都知道张之洞乃是清末封建官僚中的頑固派头子之一。他著“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目的是在于反对当时的維新运动，来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反对民权。根据张之洞說来，中国的封建專制政权以及附丽于其上的一切旧道德旧文化，决不可变。这样露骨反动的主张，連梁启超也批評它說：“不三十年將化为灰燼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聞者犹將掩鼻而过之。”不幸陈寅恪先生中了他的毒，接受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帶着有色眼鏡来看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的历史，結果到处发现“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的主张（陈先生把唐代古文运动看成尊王攘夷思想的发扬，就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这种观点应用到我国今日的文化发展上面，就得出下列的結論：“窃疑中国自今日（1933年）以后，即使能忠实輸入北美（按指资产阶级文化）或东欧（按指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其結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归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获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来之学說，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不管什么思想传播到中国来，如果不向中国封建文化妥协，实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不能站得住脚，封建文化是不能动摇的。陈先生既然把社会主义思想錯誤地看成东欧的思想，他就在暗中忧虑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用夷变夏”引致中国文化（实則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灭亡。所以他在解放后寄北京友人的詩中說：“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这种思想，也就是陈先生在解放以来所以对馬克思主义采取深閉固拒态度的思想基础。我們不能不指出，这种思想在今天，是比較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的。

掌握并运用馬克思主义辯証方法关于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观点，那是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做到的。工人階級根据这种观点認識到：被压迫、被剥削的階級进行革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我們在政治上要做革命家，而不能做改良主义者。頑固地維護封建礼教的人不可能不敌視辯証方法，不可能不以憎恨的态度来对待现代社会的一切变化。陈先生曾說过：

“尝綜览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誠庄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这一段話暴露了陈先生对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抱着相对主义的态度。他不相信这些变化是能持久的，他相信历史的进程“回环往复”，到头了还会倒回来；他有时又以旧眼光看新的事物，惡意地把新事物攻击为腐爛的旧东西。他写了一首小詩譏諷馬克思主义：“八股文章試帖詩，尊師頌聖有成規。白头宮女呵呵笑，眉样如今又入时！”归根到底，陈先生仍然是認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自己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这和辯証法显然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陈寅恪史学方法和馬克思主义辯証方法的根本分歧还突出地表现为对矛盾的看法，他和我們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教导我們，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則只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論）。从历史的发展來說，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階級之間的矛盾。我們并不排除外因，但外因只能通过内部的规律性来起作用。陈先生把外部原因从内部原因割裂开来并且加以片面的夸大，这样就抹煞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陷入偶然論的錯誤。例如唐代封建地主階級内部的矛盾，即身分性地主和非身分性地主的矛盾，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結果。要分析这一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应从根本上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的特殊性入手，即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氏族制度残余的長期保留而发生了因貴致富的門閥豪族——身分性地主的長期存在。其次則应分析清末唐初以后社会财产占有状况和階級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由于均田制度并未損害土地私有制，在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影响下，中小地主的地位开始上升，并且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与过去壟断政权的大族官僚集团展开了劇斗。但是，陈先生却从外部矛盾来解释这项历史发展，他認为东突厥衰敗后，突厥本部和別部的諸胡族分別迁入中国边境，河北地区胡人一天天增多，就把長期以来在河北聚居的山东士族迫得离乡出走，这些山东士族

丧失了家乡的根据地后，不得不从科举出身，这就和中小地主发生尖銳的冲突（见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陈寅恪：論李栖筠自徙徒卫事）。显而易见，这样从表面的外部原因来解释历史是錯誤的。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两件時間空間相隔遙远的事件随意牵扯起来，这只能是概念游戏而不是历史科学。为什么破亡之余的胡部能够赶跑占統治地位的山东士族呢？这中間更本質的原因，陈先生就沒有去探究。过去梁启超曾經运用和陈先生相类的方法証明汉代进攻匈奴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同样說明忽視事物内部矛盾的形而上学史学方法必然彻底破产。

在处理矛盾的問題上，陈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的錯誤，就是以次要矛盾来掩盖主要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农民階級反抗地主統治的多次起义乃是推动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封建社会中的一切其他矛盾，对这个主要矛盾說来，都只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須先以全力抓紧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問題才得迎刃而解。但是陈先生却夸大了封建地主階級内部各集团間的矛盾，把它看成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主流。他从資產階級观点来看階級，漠視社会階級划分的物質經濟基础，把封建地主階級内部各个集团也都称为“階級”，这样，就使主要矛盾更加模糊不清。例如在研究汉末和三国一段历史时，应当着重研究黄巾起义的背景、发展和影响，但陈先生却把注意力放在地主階級中大族（袁氏）和寒族（曹氏）的矛盾斗争上面。他沒有想到，不先把从黄巾起义表现出来的没末农民和地主的矛盾研究清楚，对大族和寒族的斗争也不可能有深入的理解。袁曹两支地主武装都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他們共同屠杀起义农民，特別在镇压起义农民黑山軍时曾經密切合作，只是在农民起义已經失敗，統治秩序重新稳定的时候，袁紹和曹操才尖銳冲突起来。在袁曹斗争中，曹操对农民作了一定的讓步，实行屯田政策，稍微減輕剥削。而代表豪族大地主的袁紹是不可能这样的，他仍然繼續縱容大地主加紧剥削农民。在这样情况下，袁曹的力量对比迅速发生变化，袁紹終于为曹操所灭。这就可见，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的发展，对主要矛盾是占从屬地位的，是圍繞着主要矛盾展开的。陈先生夸大了这个次要矛盾，把它从主要矛盾割裂开来，結果不但不能抓住問題的中心，連他自己重視的袁紹、曹操間的矛盾发展过程，也不能分析清楚。

### 三

陈先生的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陈先生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陈先生以“元祐党家”（见他的《轍王国維詩》）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按理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封建礼教多少应该起一点摧陷廓清的作用，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环境里，特别是在陈先生回国后所交游的圈子的气氛影响下，陈先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却不能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而只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系统内占一个“为用”的次要地位。陈先生一直对清朝同治以后洋务运动的一段时间是非常懂憬的，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进入历史舞台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则是很看不顺眼的。在他看来，清代末年“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煥且暮，京华冠盖萃英贤”（《轍王国維詩》）的太平日子，直到1957年，他还写了“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的诗，不胜抚今追昔之感。另一方面呢，他对中国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政权则极不满意，称为“潢池小盗”，满腹牢骚地写：“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儕皆苟活。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俱见《轍王国維詩》）。正因为他反对人民革命，他就不能不反对指导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反对辩证法。事物内在矛盾的法则，指出封建社会的文化必将彻底灭亡（当然其中好的东西我们还可批判地吸收），这正是陈先生所不愿意承认的，所以他不能不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他之所以在认识历史真相中要借助于“神游冥想”，也是和他的政治态度有关的。他提出要对古人抱一种之同情，究竟是怎样的同情呢？同情谁呢？在对待剧烈战斗着的双方中，不能同时对双方都表同情，例如同情王充就不能又同情讖緯之学；同情黄巢就不能又同情唐末封建王朝，这是很明显的。而陈先生的同情，从他攻击黄巢破坏东南财赋地区致唐于灭亡，从他推崇章庄的“秦妇吟”等来说，其“同情”显然是不在黄巢方面的。陈先生为“王静安先生遗著”写序，希望有人能理解并同情王国维。他说：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繼之以死。其所死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

一時間一地域而已，盖別有超越時間空間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共同時間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这一段话，充分表露了他所要同情的是甚么样的人物？原来正是王国维这样的死抱住封建王朝不放的人物。陈先生甚至还痴望在神州以外的九州，今世以后的来世，会有人读王国维的书“神理相接”而表同情于王国维的“奇哀遗恨”。我们不能不向陈先生进一言：我们对王国维在学术上的业绩，并不会一笔抹杀，而是将给予批判的吸收，但是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人表同情于王国维的“愚忠”的政治态度了。封建王朝的孤臣孽子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会得到人们的任何同情的。

陈先生的政治思想使他在某些方面还受到胡适派实用主义的毒害。当然，陈先生和胡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胡适是我国人民的凶恶敌人，是个卖国的奸贼，而陈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但是，事实说明陈先生的史学方法一部分的确受到胡适派的影响。陈先生在早期关于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演变等考证中明白采用了胡适派所谓“历史的方法”，其后在使用“以诗证史”的方法中，则陷入俞平伯先生等新红学派的窠臼中，混淆了诗歌的艺术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仿用研究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生平的方法来考证崔莺莺的籍贯、姓名。特别显著的，是陈先生也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还对中国文化所受西来影响表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觉到，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实际上也就是要继续深入肃清实用主义在我国史学界的影响。

我们也不是要全盘否定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要抹煞陈先生三十多年来的辛勤劳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白专的路的是走不通的，是自误误人的。以陈先生掌握史料、语文工具等条件较优越，但是由于他的史学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致使他的研究中发生了许多基本性的错误，旁的条件更不如他的人，坚持“白专”的道路，又将何处讨生活呢？我们通过这次红专辩论和教学改革中提高了认识，下决心“兴无灭资”，决心要继续拔掉史学界中的白旗，力争史学思想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彻底胜利。

1958年9月18日初稿

10月5日修改



# 我們不需要这样的“旁証”

——評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証”

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年級学生 沈奕鉅

“‘桃花源記’旁証”是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报11卷1期发表的一篇論文，解放后又收在“两晋南北朝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中。在这篇文章里，陈先生不惜旁征博引，企图割裂“桃花源記”的“紀实”与“寓意”二者之关系，“使之不相混淆”；陈先生也自鳴得意地認為这篇文章是“別拟新解”，对于“考史論文之业不无一助”。但是，我們在讀完陈先生这篇文章之后，觉得“考史”固无所助，“論文”則不特无助，相反地，由于陈先生这种离开文艺特征的煩瑣的考証，反而貶低了“桃花源記”所表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我們知道：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長期逆轉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迭紛陈。“桃花源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古农民对美好的未来的社会的憧憬，应该是一篇具有人民性的寓意文章；尽管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生活有所取材，但也不能用煩瑣的考証方法硬把它划分成“寓意”部分和“紀实”部分然后特別在“紀实”这一方面作煩瑣的考証。因为一切的文学作品，虽然一般地取材于实际生活，但又是“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有普遍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对于这种“更帶有普遍性”的文学作品煩瑣的考証，从“考史”的角度來說，是枉費心机，必將陷于牵强附会的泥坑；从“論文”的角度來說，則牛头馬嘴，把“典型”还原为“素材”。因此，我們說，陈先生这种煩瑣的考証，对于“考史論文”不但毫无所助，而且是很有害的。

自然，我們并不反对对文学作品的創作取材、时代背景、典型塑造以至作者的意图的必要的考証，这特别是对于古典文学作品，有时还是很需要的，能帮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但是，陈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証”，显然不是这样的。我們且看看陈先生“‘桃花源記’旁証”了些什么和怎样“証”的。

在“桃花源記旁証”一文里，陈先生列出他考証的要点如下：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記紀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間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綴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晉”等語所作成。

戊、淵明“拟古詩”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記互相印証发明。

这里，我們先来“論文”。

既然我們知道“桃花源記”不是一篇“晋人避乱記”的实录（这一点連陈先生也不得不承認的），而是取材于实际生活的“寓意”之作，那么，讀者首先应该理解的，是作者“寓”了什么“意”，是人民之“意”，还是“封建統治阶级”之“意”，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問題。其次，讀者要理解的，是作者怎么表达出了这个“意”，所表达的“意”是否具有感染讀者的力量，也就是作品的艺术性問題。这就是我們研究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如果陈先生的考証，能为我們提供出有助于理解“桃花源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材料，即通过陈先生的“旁証”，使我們知道，作者所“寓”之“意”是从什么生活和追求出发的，又是在什么生活和斗争中集中和概括起来的等等，那我們将会十

分珍貴陳生先的勞動。可惜的是陳先生的“旁証”，化了許多筆墨，只“証”出了桃花源是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等等，這對我們理解“桃花源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難道会有什么幫助嗎？對於陳先生來說，其實也不難理解的。因為這正是資產階級治學思想的必然結果。

我們知道：文學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但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這就是說，文學是以社會生活的事實作基礎，但不是某個社會現象和具體事實的紀錄。即使文學作品取材於某些具體事件和具體人物，作為作品的模特兒，但那是經過作者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深刻的觀察，滲進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用集中概括的藝術手腕創造成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作品的藝術形象便成為整個時代中的共同性格和某一階層中的典型形象。如果有人要考証文學作品中的內容和事實，這無異是要找尋魯迅先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阿Q一樣，任你遍貼告示，高懸獎賞，也只是一件永無結果的徒勞無益的傻事。毛主席所作的關於藝術工作的指示，我們並不要求陳先生能夠理解，事實上也是陳先生所不能理解的。

在陳先生所著的書籍及言論中，陳先生常常不承認人類歷史發展有其客觀規律，不承認階級鬥爭是貫串歷史發展的紅綫，因此，他只能在交錯紛紜的歷史現象中作一点一滴的考証。這些考証工作有時雖能為歷史科學服務，事實上，陳先生幾十年所作的考証工作，對我國的中古史也提出了有益的意見。但在陳先生頑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和主觀唯心主義史觀的指導下的為考証而考証態度，就使他陷入了庸俗的趣味主義和文字遊戲的死胡同中去了。桃花源記的考証，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再從“考史”來看，陳先生又“証”出了些什麼來呢？

在“‘桃花源記’旁証”這篇文章中，恕我不恭地說一句：陳先生連僅有的一點考據工作也沒有做好，不能証實他那“紀實之文”的假設。陳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翻遍了晉書、太平御覽、資治通鑑等等，把能夠說明他的論點的資料都征引出來，不符合要求的便刪掉。我們現在姑不問陳先生所征引的資料有無問題，就以劉裕率師入關一事來談吧：“南史”記載劉裕進關時已是夏天；資治通鑑也記載劉裕四月入洛陽，其入潼關當在入洛陽之後，按理桃已成實，又何來“落英繽紛”？陳先生知道在這裡不能自圓其說，於是轉一個彎說：“山地高寒，節候較晚”。我們要問：陳先生到底根據什麼能下這樣的

判斷呢？禮記月令載“二月，桃始花”。禮記月令是根據潼關一帶的天氣寫的，難道“山地高寒”竟使樹木結實相差這麼久的時間嗎？還有，陳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認為桃花源記是直接取材於戴延之探洛川之事，而又和劉驎之入衡山采靈藥一事牽連混合在一起。這樣把在同一時代中所發生幾件不相關的事情硬拼湊在一起。人們不禁又要問：這個漁人又是誰呢？可是陳先生卻回避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陳先生再“博”些，也是無法“証”出來的。

陳先生可能自知這篇文章的考証漏洞百出，所以，在文章前面定下了脫身之計說：“本文止就紀實立說，凡關於寓意者，概不涉及，以明界限”，其真意就是能考証的便是“紀實”部分，其不能解釋的便屬於寓意部分，說是屬於“陶公特加之筆”，“文士寓言，故作狡獪”，其實，狡獪的恐怕不是陶公，而是陳先生自己。陳先生玩弄這樣的手法，和破產的“新紅學派”沒有什麼兩樣，同是販賣反動透頂的實驗主義的考証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証”，只可惜沒有証出一個名堂來。我們認為科學研究工作中是容許假設的，但是假設要建立在有充分的事實可能根據上。假設是待証的真理，它要在實踐中受到檢驗。陳先生在這裡的假設，只是將五光十色的碎布，拼湊成篇，事實上是難以支持他的結論的。所以，陳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末段說：“穿凿附會之譏固所難免”，也許這是陳先生謙虛之詞，其實却正好擊中了陳先生此文要害之處。

我們還覺得陳先生這篇文章不特在考據上有些站不住腳，它所發出的影響也是非常不好的。因為“桃花源記”在我國文學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一篇具有人民性的文學作品。陳先生用考証的方法把它扯得支離破碎，這就使這篇作品喪失了它的積極的社會意義。桃花源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農民的要求，它的朴素的幻想後面，隱藏着農民深重的苦難和血淚，陳先生把它做為紀實文章來理解，這就導致了一個這個的結論：桃花源只是為躲避符秦和“寇盜”的處所，抹殺了四世紀中國社會的階級剝削和階級鬥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必須對“‘桃花源記’旁証”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嚴肅批判的道理。

陳先生一向是以掌握史料著名的。我們也並不否定這一點。但如果不同時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即使掌握更多的史料，也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不為人們所需要。對於這個真理，“‘桃花源記’旁証”倒是一個很好的“旁証”。

# 右派分子罗克汀在哲学教学 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

麦祥 黄春生  
施蔭民 李培荣

右派分子罗克汀在鳴放期間放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已經受到彻底的駁斥。然而挂着“哲学家”的金字招牌，窃据中山大学哲学教研室领导职位的罗克汀，在几年来的哲学教学工作中贩卖的貌似教条主义实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流毒頗深，有必要就这方面繼續进行揭露和批判。

从1953年开始，罗克汀便在中山大学担負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几年来，党一再強調在理論教学工作中必須貫徹执行“学习理論，提高認識，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針。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应当联系当前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迫切問題，引导学生去批判自己头腦中的唯心主义和各种资产階級思想。而罗克汀却一直站在资产階級个人主义的立场，异常頑固地拒絕执行党的这些指示。他不仅在教学工作上坚持“空談理論，鄙視实际，提高个人，拒絕改造”的资产階級方針，而且为了对抗党的理論联系实际的教學方針，他还捏造和宣扬了一套歪曲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修正主义言論。

罗克汀从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即取消階級分析的观点出发，夸大高等学校的“特殊性”而否定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宣扬所謂“白紙論”而否認青年学生思想改造的必要。

党在几十年来的理論建設工作中創造了理論結合实际的以整风形式进行理論学习的寶貴經驗。过去解放区的学校和解放初期的革命干部学校都采取这种方法进行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学习方法，它完全符合“理論联系实际”的馬克思主义的原則。高等学校的具体教学对象虽与革命干部学校不同，但学习馬列主义的方法不应有两样。因为脱离了“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就只能是理論脱离实际的方針。罗克汀别有用心地夸大了两种学校教学具体对象的不同而作出否定“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的結論。他認為过去革命干部学校那种以整风方式进行理論学习的做

法已經过时了，对目前高等学校的政治課來說已經不适用了。他列举高等学校的两大特点：

(一) 学生比較純洁而且沒有（或者很少）实际工作經驗。

(二)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專業課。

从这“两大特点”出发，他便作出了在高等学校的馬列主义学习不必結合学生的思想改造的結論。他的“邏輯”是这样的：既然大学生的思想純洁，有如“白紙”，便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采取整风的形式进行学习；而且大学生既然沒有什么工作經驗，也就沒有什么实际可联系了。看来，整风的教学經驗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了。那么，应该怎样进行理論教学呢？罗克汀主张进行“正规的”“系統的”理論教育，多进行“正面”教育，便可收“潜移默化”之效。同时，既然高等学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專業課，那么哲学的教学便只应結合專業。因此，他提倡“世界观与方法論并重”，特別強調要讓学生掌握学习專業的方法論。自然，这样一种教学目的是不能采取整风的学习形式的。

罗克汀的“白紙論”，實質上是一种認為階級分析方法已經过时的修正主义观点。在“白紙論”者看来，不管什么階級出身，什么政治立场，什么思想面貌，只要他是学生，都是純洁的“白紙”。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在这里都不适用。正是从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出发，罗克汀在理論上坚决否定在高等学校学生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教学工作中抽掉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階級性，把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專業服务的技術性的东西。可是，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情况，給了罗克汀一个响耳光。事实证明，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是为资产階級右派效劳的反动观点。

罗克汀打起“科学性”和“系統性”的幌子而閹割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罗克汀既然認為在高等学校应该进行“正规的”“系統的”“正面的”理論教育，他在教学工作中

便非常強調哲學的“科學性”和“系統性”。他在教學工作中完全不過問學生的思想情況，自己不參加課堂討論和輔導工作，只在課堂上按照一套據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完全脫離實際的教學大綱給學生傳授哲學知識。人們聽到的只有空洞的哲學名詞術語、概念、範疇、規律等。對當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他從來沒作過分析。為了“應付差事”，他只是在講述理論之余附帶地敷衍幾句。為了達到“結合專業”的目的，他在講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大量講述各種自然科學，完全不考慮教學效果。羅克汀還以為大量羅列這些缺乏分析的自然科學材料，才算是“充分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才足以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學生聽不懂，他便強詞奪理地說：這是“哲學科學性與學員水平的矛盾！”。在這種強調“科學性”與“系統性”的幌子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和戰鬥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活的靈魂被他閹割掉了。充滿戰鬥氣息的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被羅克汀講成爲似乎與现实生活無關的死氣沉沉的東西。

哲學教學要不要科學性與系統性呢？我們並不反對真正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問題在於：應該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我們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是與它的革命性、實踐性、戰鬥性等分不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成爲科學真理，正是由於它與生產實踐和革命鬥爭緊密地聯系着。列寧說：“這個理論（指馬克思主義——作者注）之所以博得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不可遏止的同情，也就是因爲它把最高限度的嚴格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頂峰）和革命性結合起來，並且不是把這兩種特性偶然結合起來，不僅是因為這個學說的創始人自己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特性，而是因爲它把這兩種特性不可分離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的內部。”<sup>①</sup>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它的科學性之所以必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爲這個學說的本質所決定的。不僅因爲這個學說的創始人既是理論家又是革命家，而且因爲這個學說首先是一種指導人們改造現實社會的革命學說。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實踐性而修談它的科學性，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就是對它的有意歪曲。顯然，羅克汀所標榜的“科學性”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性，這只不過是作爲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實踐性而打起的幌子而已。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是有着密切聯系的。自然科學新的成就是科學唯物主義產生和發展

的條件之一。我們並不反對在講述哲學時也注意到自然科學的論證，但羅克汀在課堂上大講特講自然科學，是別有用心。他不首先注意從革命鬥爭和政治生活方面去論證哲學原理，引導學生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去分析當前政治生活中的迫切問題和解決自己工作中、生活中和思想上的實際問題，却在“結合專業”的幌子下引導學生脫離政治。羅克汀在哲學教學中，就是這樣以所謂“科學性”、“系統性”來替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和“實踐性”的。

羅克汀以“方法論第一”的手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爲一種只是爲專業服務的技术性的東西。

羅克汀到處宣揚在高等學校講哲學應該是“世界觀與方法論並重”。他特別強調要“結合專業”，教給學生一套掌握專業的方法論。因此，他在講課時便花了很多時間尽可能多的講授自然科學中的問題（實際上是堆砌一些材料），引導學生去鑽研這方面的問題。說的是世界觀與方法論並重，實際上是“方法論第一”。這樣一來，革命行動的指南變成了爲專業服務的技术性的東西；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變成了純粹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政治課變爲專業課的附屬物；學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目的不是爲了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思想方法，不是爲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而僅僅是爲了把專業課學得更好一些。

哲學不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嗎？是的。但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革命地改造世界（包括主觀世界）的方法。高等學校的學生除了學習專業課以外還要學習政治課，其目的難道就僅僅在於使他們掌握一些技術性之類的知識嗎？脫離政治，脫離思想來講哲學，那算什麼政治課呢。羅克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貶低爲一種只是爲專業服務的技术性的東西，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粗暴的歪曲嗎？

羅克汀這些修正主義觀點，其流毒是頗大的。受了這種思想毒害的人，既然把哲學僅僅當作爲專業服務的技术性的東西，用來輔助業務課的學習，他所走的必然是“只專不紅”的道路。至於從哲學課中學到的一些哲學的名詞術語，充其量也就只能爲他的科學“論著”披上一層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已。中山大學某班同學在學完辯證唯物主義以後集體簽名要求教務處同意他們下學期免修歷史唯物主義。

① 見列寧著“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第89—90頁

在这些同学的心目中，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結合他們的專業，不能作為他們學習專業的方法論，因此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去學習它。右派分子羅克汀就是企圖這樣把青年學生引向脫離政治，埋頭鑽研業務的“白專”道路上去的。

羅克汀還宣揚“分工論”，反對黨對政治課的領導。

在反對政治課要負擔對學生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時，羅克汀宣揚一種“分工論”。他把政治課教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分割開來，說政治課只管系統的理論教育，政治思想工作則應由黨團組織負責。我們認為他宣揚這種“分工論”的目的不僅在於反對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而且還在於反對黨對政治課的領導。照羅克汀的說法，既然政治思想工作由黨團組織管，政治課就不應該去管了。同樣的，理論教育既然由政治課去管，黨、團組織就不應該過問了。事實上也是這樣：幾年來，羅克汀一方面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從不過問，另一方面又多方面抗拒黨組織對政治課的領導，他不僅抗拒黨的思想領導，拒不執行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方針，而且抗拒黨的組織領導，把持哲學教研室，不許黨過問教研室的工作。這一點在他負擔夜大學的哲學課期間表現得特別突出。黨委的領導同志在夜大學教學工作總結中對羅克汀的教學工作中的錯誤提了意見，他不但拒不接受，而且認為是那位同志“擺出代表組織的面孔”發動黨員“整”他。在羅克汀負責哲學教研室期間，黨的方針、政策，很難在哲學教研室貫徹。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羅克汀，自以為理論水平甚高，因此黨不能領導他。在理論工作上居然也敢在黨的面前充“內行”，認為黨組織是“外行”。羅克汀在思想上、行動上都是

否認和反對黨的領導的。

羅克汀這些修正主義觀點，是以教條主義形式表現出來的。乍看起來，似乎羅克汀在這方面的錯誤不過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其實，羅克汀的錯誤既不是由於思想方法的“左”的片面性而產生的教條主義，也不是一般的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他是企圖打着“科學性”“系統性”“方法論第一”等幌子，閹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革命性和戰鬥性。他不僅拒絕執行黨的理論學習方針，而且在思想上，組織上反對黨的領導。他不僅不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改造自己的思想，而且捏造各種“理論”，反對黨在知識分子中進行思想改造的方針。這些錯誤的產生是由於羅克汀長期以來堅持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拒絕改造自己。形勢不斷向前發展，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不但沒有得到克服，反而愈來愈嚴重了。這些思想與黨的矛盾也愈益尖銳。最後，他便從思想上與黨對抗發展到政治上的反黨。他的教條主義也逐漸由一般的脫離實際、脫離政治而發展成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些根本問題上的修正主義。羅克汀與其他的修正主義者一樣，口頭上說着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實際上是割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他從馬克思主義中摘取了某一些次要的東西加以夸大，而割棄了它最重要的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的字句來裝飾其修正主義的貨色。正象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者的衣衫。”因此，在羅克汀的修正主義言論中，到處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看起來都似乎有些道理。一些人之所以容易受到他的蒙蔽而不自覺，原因也出這裡。

### “廣東經濟學會”籌備委員會成立

為了團結全省經濟工作者和組織所有研究力量，開展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為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廣東一部分經濟學者和經濟工作者於日前發起組織“廣東經濟學會”。主要的任務是：開展對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學習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從事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及廣東地區實踐中提出的有關經濟問題；進行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和修正主義觀點的批判。該會籌備委員會已於9月29日成

立，並已積極開展籌備工作，開始廣泛徵求會員。凡有志於經濟研究工作，並且有一定理論水平的人都歡迎參加。目前申請入會的已有一百多人。

該會籌備處設在廣州市越秀北路222號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內，並備有簡章，凡願意參加該會的，可向籌備處領取入會申請登記表。

該會預定於本月內正式成立。

# 学哲学的新道路和新方法

杨 棧

我們肯定哲学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肯定实践出哲学，日常生活里就有哲学的道理，肯定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的劳动人民比较地更容易掌握这一理论武器；但这并不是说，实践就是理论，生活就是哲学，劳动人民是天然的哲学家，可以不经过艰苦的努力就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既然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就不同于个别的、零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更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常识。

因此，任何人要攀登哲学这一人类科学的高峰，都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既从实践中学习，也从理论上（经过实践检验的总结）学习。

学哲学也存在着两种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过去知识分子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另外一种是在现在劳动人民初步摸索到的、也是很早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教导过我们的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至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种摆迷魂阵的方法，这里就不去提它了。）

过去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学哲学的呢？他们一手拿着厚厚的洋装书，一手握着红蓝铅笔，一面读，一面加圈划线，有的还做了笔记，他们的态度是虔诚的，也是认真的，可就是不明确学哲学的目的，更不懂得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这样，尽管他们“读破万卷书”，结果也不过是学得一大堆名词概念、定律范畴之类的死东西，谈起哲学来可以滔滔不绝，用起哲学来却是一窍不通。这种学习道路和方法，我们把它叫做“哲学和尚”的道路和方法。

现在已经参加学哲学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从学习中摸索到学哲学的新道路和新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屡屡教导我们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他们学哲学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理论战线上了。这种学习道路和方法，我们把它叫做“哲学战士”的道路和方法。

这就是学哲学的两种道路和两种方法。两种不同的学习道路和方法，必然要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哲学战士”，反科学的学习方法则培养了“哲学和尚”。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哲学战士”，而每一个有志学哲学的人，也总是愿意自己能成为“哲学战士”，而不要成为“哲学和尚”的。因此，如何学会掌握学哲学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是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也就明确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需要，离开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因此，任何人要学这种哲学，都得先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哲学？这就是学哲学的目的性问题，也就是有的放矢，还是无的放矢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十七年前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曾反复地批判了那种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只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而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的放矢”的态度，提倡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有的放矢”的态度。

哲学讲的是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问题，看起来很抽象；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才给弄得那么神秘，变成只供夸夸其谈的不着边际的东西。其实，作为

一种理論武器的哲学，倒是最具体不过的。天津食品加工一厂的老工人魏長庚把哲学形容为“一个万能的工具”，真是一語道破了哲学的“秘密”。把哲学当作一种“万能的工具”，不是很好地說明了哲学的具体性嗎？

为什么工人一接触了哲学，就能够如此深刻而形象地道出哲学的具体性呢？我看主要原因在于工人以及其他的劳动人民学哲学，絕不是“只为了單純的学习”，而是为了解决生活实践、工作(生产)实践、斗争实践中的問題而学习，也就是有的放矢。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学哲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用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来駁斥該厂右派分子的伪装成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假理；广州中一烟厂的工人学哲学的目的要求，是为了用毛澤东同志的矛盾学說来解决該厂工人在生产上和思想上的具体問題，为了更好地参加工厂的管理。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一点，几乎是所有参加学哲学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共通的特点。也正是这种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使得他們一跨进哲学的門槛，首先接触的不是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掌握到一种“万能的工具”，这种工具是为他們的实践服务的。

但是，当哲学还没有跳出少数知識分子的圈子的那些时候，情况就不完全是这样了。有这样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仅不認“有的放矢”是必要的，而且似乎学哲学一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就会使哲学“簡單化、庸俗化”，就会变成一种“时事政策”，就会破坏哲学的“科学性”。于是，在哲学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怪现象：談起哲学問題来夸夸其談，但是言之无物；写起哲学論文来洋洋大观，但是不解决任何实际問題；有些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講坛上大講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知道講这些是为了什么；而哲学系的学生呢？更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对这些人來說，哲学自然不是一种可以射“的”之“矢”，只不过是一种可供玩賞的“古董”，一种裝飾門面的“招牌”而已。

也許在这些人之中，有些人并不完全这样盲目，甚至他們的目的性也很明确。但是，那是什么样的目的呢？是把学哲学当做一种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一心希望学成之后，就可以大写文章，可以做“哲学家”，以便名利双收；这种以个人名利为目的而去学哲学的“哲学市儈”，自然要比“哲学和尚”糟糕得多！

正是針對着这种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我們說，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有的放矢”的学

哲学的道路和方法，是一种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

学哲学的目的性問題实质上是一个立场問題。为什么有人用“古董”鉴赏家、以至“市儈”的态度来对待馬克思主义哲学，而有人却以战士的姿态来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呢？主要的是前者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所以，只要能夸夸其談，只要能裝飾門面，只要可以达到个人目的，也就算是学会了哲学了。后者則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所以，为用而学，边学边用，即所謂“立竿见影”。因为站在革命立场的人，他們对党和革命的事业，有着高度的責任感，他們迫切要求掌握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論武器，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推动生产。很多工人一談到学哲学的迫切要求，总要提到工厂实行“两参一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的問題，提到劳动人民在国家的主人翁的地位問題。

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組組長杨庆同志对这个問題有过十分生动的說明：“我們小組的同志，从来也沒有想过什么是哲学，更不敢想到要学习哲学。但是，經過整风运动和总路綫的宣传之后，职工們的思想解放了，特别是厂里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进行生产技术和规章制度的改革），我們工人当家作主的責任感进一步加强，認識到政治挂帅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为了管理好企业，发展生产，不仅要提高文化，掌握技术，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工人要求学习政治理論，要求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这正好說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是为了当好家、做好主才如此迫切地要求掌握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論武器的。

因此，学哲学的目的性問題，并不是一个單純的方法問題，必須首先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确立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才可能解决学哲学的目的性問題，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 三

学哲学的目的性是否明确，还直接关系到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上的另一个方面的問題，即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的問題。

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为了掌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那么，必須从实际出发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要改造世界，必先認識世界，而要認識世界当然要从这个客观世界的实际出发，否則，就只是一种主观臆測了。

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又說：“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共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列宁把这种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称之为“馬克思主义底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底活的灵魂”。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实际，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掉了活的灵魂。

但是，知識分子学哲学，却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他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怎样“詳細占有材料”，从其中找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并不是如何用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理解和批判一切問題，从而找出正确解决这些問題的方法，而是死鑽牛角尖，做概念游戏，他們就是这样躺在云端里自我陶醉的。

知識分子学哲学的这种道路和方法，除了立场的問題之外，是由于他們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恶习造成的。因此，要彻底改造这种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就必须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使理論联系实际，把死的概念变成活的概念，从“哲学和尚”轉变为“哲学战士”。

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哲学，則总是从实际出发的。他們一般的是从摆情况，提問題，抓矛盾；然后从毛澤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掌握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再用这些原理来分析和解决具体問題。这种学习方法完全符合于辯証唯物主义的实践——認識——实践的公式，是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最近这个时期来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学习哲学的收获和成績，足以証明这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

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就是采取这种学习方法。他們既沒有上大課、听报告，也沒有按照書本上逐章逐节閱讀討論，而是采用大鳴大放辯論的方式，大家摆情况，提問題，以哲学为武器进行分析，解决实践上的問題，并且通过再实践，进一步加深对理論的認識。他們正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摸索到这种“由实际到理論，由感性到理性”的学习方法的。

荆山农业社的农民学哲学的特点，是他們着重了解哲学原理是否符合自己所經歷的級阶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邏輯；他們不扣名詞，不鑽概念，却从党领导的長期斗争的实践来肯定原理；他們注意哲学

原理是否能使自己眼睛明亮，能否解放自己的思想；他們特別注意掌握哲学原理的實質，边学边用。现在，几乎所有学哲学的农民，都以“人民公社化高潮”为学习課題；因为建立人民公社已經成为农民生活中最集中也是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問題。这些特点說明他們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也是从实际出发的道路和方法。

从被称为“普遍一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机枪連的战士向胜昌同志所談的学哲学的心得中，可以看到他的学习方法也是从实际发出的。他从地主对自己的剝削这一事实，認識了級阶、社会发展的规律，又从自己的翻身，認識了我們国家能建設社会主义，都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因此更加热爱党的事业。他說：“讀了毛主席的‘实践論’和‘矛盾論’，使我改变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遇事就和班里的同志商量，自己也以身作则，因而班里的团結加强了，政治和軍事成績都在良好以上……”。

为什么說能否从实际出发、理論密切联系实际同学习的目的性是否明确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任何人來說，实际是多方面的，有直接的和比較直接的实际，有間接的和比較間接的实际，有和人們的生活、工作、思想发生內部联系的实际，也有仅仅是外部联系的实际。如果学哲学的目的性是明确的，联系的实际就能切合、具体；如果学哲学的目的性不明确，即使意图联系实际，結果还是脱离实际。有一个中学，教师們在討論“質量互变的定律”时，本来有許多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問題，如新的教育方針政策的問題、学生成份的变化問題等等大都可联系，但他們却十分热烈地爭論把紙張裝訂成書本是否从量变到質量，并把这种爭論叫做联系教师生活的“实际”。要克服这种貌似联系实际，实则脱离实际的学习方法，唯一的办法是解决学哲学的目的性問題。这特别是对知識分子來說。

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既然一般地有着丰富的級阶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在学哲学的时候，也就比較容易采用这种从实际出发、理論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但是，也还不能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在开始学哲学的时候，就走过一段弯路；广州中一烟厂的工人，也是在摸索中才逐步明确过来的。因此，学哲学的道路和方法問題、对于知識分子、特别是那些長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識分子，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在学哲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选择正确的道路和科学的方法。



# 江門市檢察院的干部是怎樣學哲學的

## 中共江門市委宣傳部

江門市檢察院在今年六月份起即開始組織干部理論學習，並組織了自學小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以“哲學常識”讀本一書為基本課程，結合閱讀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當時，他們也訂出了一套學習計劃，開列了一套提綱，如什麼是哲學，什麼是物質和精神，為什麼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兩者的關係又怎樣等等。但由於干部對學習的目的不明確，學習的方法不對頭，因此，教條主義氣味很重。有些干部認為學習哲學的目的是在弄清概念，學些理論可以裝點門面；有些干部雖知道學哲學有些用處，但又認為要用得上哲學，還是未來的事。在學習方法上，他們雖然也知道理論要聯繫實際，但如何聯繫，大家心裡都沒有底。於是，在學習中，他們使用了老一套的學習方法，從概念出發又回到概念，先在書本上鑽名詞，以例子套原理，結果學習下去，便象鑽進牛角尖一樣，越鑽就越脫離實際，即使有時聯繫到了實際工作上的問題，也只是生硬地牽扯一下。當談到事物的发展變化時，有的說：“地是怎樣變化的？”有的答：“是地的岩漿在變”。在談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時，有的說：“樹，人叫它是樹，它才成為樹，不叫是樹就不是樹”。有的說：“人造衛星是人造的，沒有人創造衛星之前，人造衛星是沒有的，那不是精神創造了衛星嗎？”有些問題雖然聯繫實際談了一下，但實際的東西和書本上的概念，只是生硬地湊在一起。結果，參加學習的人都覺得學習的內容很空洞，老是在一個個名詞上兜圈子，感到學習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同時，大家覺得在學哲學之外，又要學業務、又要學時事，許多東西都要學，時間不夠，而且思想很分散。有些人甚至因為鑽名詞感到枯燥無味，在學習、閱讀或討論時竟打起瞌睡來了。顯然，這樣學習下去，不但學不到什麼，而且參加學習的人在時間上和精力上

也很難安排和應付。

八月上旬，中共江門市委根據省委的指示，要求各學習小組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同時明確要求學習應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解決實際問題。檢察院哲學自學小組便修訂了學習計劃。在修訂過程中，他們曾經提出過兩種學習方法：一種是按照“矛盾論”的章節順序學，然後聯繫工作的實際；一種是根據當前檢察工作任務和干部的思想情況，提出幾個專題，按照“矛盾論”有關章節的原理，結合參閱業務文件，以分析和解決當前實際問題。經過反復研究，大家認為後一種方法是從實際出發的方法，能夠把學哲學、學業務、研究當前工作等問題統一起來，既可增加學習時間，又易於收到學習效果，於是堅決採用後一種方法。這樣，他們就根據群眾鳴放提出的問題綜合為五個專題：一、檢察工作干部能否紅透專深；二、認識階級鬥爭的規律；三、調查研究工作的意義和應有的認識；四、區別兩類矛盾和處理兩類矛盾的方法；五、兩類矛盾的轉化條件。根據每一個題的中心，找“矛盾論”、“實踐論”等有關原理，結合業務一同學習。從工作中去印證哲學上的理論，又用學得的理論去指導工作；一邊學，一邊用，學用結合。有些干部教條主義學習方法習染較深，最初參加這種學習，一下子轉不過來，總覺得不自然。認為這只是談業務，不是學哲學。小組領導便在組內展開辯論，說明理論與實踐的正確關係和學用一致的好處。在大家認識提高的基礎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感到學習的內容豐富，有收穫，這就更堅定了學習的信心和決心；同時，因為把學哲學和學業務、研究工作等等統一起來，學習時間也由每周只有兩時半增加到每周八小時。

截至九月下旬止，該組干部通過學習已徹底破除了學哲學的神秘觀念，知道日常生活中，處處都

有哲学，能够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找出事物的因果性。同时，通过学习认识了矛盾发展的辩证规律，明确了不断革命的道理等，学习收到了初步效果。例如过去有些干部认为搞完一个突击运动，就可以松口气，现在认识到运动是一个要接着一个的，解决了一个问题接着又要解决第二个，这样才能不断地进行革命斗争。在对红专的问题上，认识到几年来虽然也经过镇反、肃反等运动，但今天不是没有敌人了。因为帝国主义一天未消灭，他们就会活动一天；政法部门必须加强对敌专政，而且斗争越深入，敌人越隐瞒狡猾，为了更策略地准确地打击敌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检察干部必须又红又专。过去一些干部错误地认为只有在工厂搞技术才算专，而检察院没有办法专。现在认识检察机关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辩证唯物观点，要了解 and 掌握阶级斗争发展和敌人变化规律，要调查研究，熟悉法律政策，善于走群众路线。这都说明了检察工作是可以专的。有的干部认识了矛盾不断发展的道理后，检查了过去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因为看不到事物的不断发展，如一个姓聶的干部学了哲学之后检查说：“以前八天办完一案，现在四小时办完，自己已认为差不多了，便自满自足，但最近已发展到不用四小时办完一案，而且其他单位也不断在提高，这才发觉自己右倾保守”。因为理论联系实际，能够明确地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通过学习亦推动了工作的进展，加强了调查研究。有一个干部过去审查批捕案件，不管地点、时间等条件的变化，只一成不变地看情节轻重来判决。经过学习后，知道某一时期对某类案件应采用怎样的策略，于是大大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有一个干部这样说：“过去审案时看不出问题，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往往盲目附和，现在懂得点辩证唯物论，遇到问题知道分析一下，这对工作帮助很大”。同时也感到自己过去干了几年来来信来访工作，不懂得如何总结，提高很慢，现在也打算总结一下了。通过学习，也使干部进一步明确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写调查报告是写了就算，不提或少提对策，而现在认识调

查工作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具体研究，才能提出措施。最近检察院调查了强奸污辱妇女的情况，干部在研究情况和处理案件上比较过去认真得多。

检察院哲学小组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据小组的总结约有下述几点体会：

一、党委重视，明确提出以毛主席著作作为纲，围绕着该院当前中心工作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学习。学习目的明确，这是学习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该院党支部书记亲自参加小组的学习，并提出联系实际的方向，因而引导全体干部自觉参加学习，并使学习有了丰富的内容。

二、在学习上展开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的斗争，批判为学习而学习，为理论而理论，从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坚决贯彻为工作而学习；为实践而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从实际出发的学习方法。检察院的学习经验证明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是有不同的结果的。理论原则套实际，结果只能导致钻名词，为理论而理论，效果很差；而从实际出发，把学习哲学、学习业务和研究工作扭在一起，通过学理论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就使得干部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有很大转变。检察院的学习经验也证明，在知识分子中要贯彻实践——理论——实践的学习方法必须通过鸣放辩论，开展两种方法的斗争，才能清除知识分子干部中教条主义方法的旧习气。

三、妥善安排时间，使工作、学习、劳动三不误，这是能够学好哲学的具体保证。检察院在整风运动中反掉了五气，工作效率提高十多倍，过去十二人的工作，现在七个人做，做得比前多，还获得专区检察系统的先进单位奖。由于工作效率提高，加上学习方法对头，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把学习的时间适当增加也不致影响工作。

四、用整风的方法进行学习，先行自学，阅读文件，然后鸣放，提问题，开展初辩，互相启发，最后把问题集中起来，抓住中心问题进行辩论。每次讨论由辅导员作中心发言，学完一节每人都要写心得和体会，小组作小结，以巩固成绩。

# 街坊妇女应该学哲学

江門市堤东区居民哲学小組組長 李鳳群

如果有人要問我：街坊妇女应不应该学哲学？我的回答是：应该学，而且应该下决心把它学好。因为现在的时代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代，妇女们当家作主和男子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自己对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会运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事务，那末，思想就会落后，在新社会里，也当不了家，作不了主。

我学哲学的時間还不久，但我已經初步認識到学哲学的好处很多。我相信和我同样是属于街坊妇女一类的那些姐妹們，特别是那些和我一样長期干家务工作的姐妹們，当会和我一样迫切要求学哲学的。如果还有些人怕学哲学或者不愿学哲学，那只是因为她们现在沒有尝到哲学的甜头。我想：要是把我学哲学的情形講出来，也許对大家学哲学和学好哲学有点帮助。

我生長在一个破产的归侨家庭里，17岁就結了婚。丈夫是个雇工，失业时又做过小販。解放前，我們生活上的困难是不說可知的。結婚后的第二年，我們就生了第一个小孩；随着又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小孩。幸而是在我結婚的第三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我的丈夫参加了工作，我們的家庭才免除飢餓和貧困。我有小孩的拖累，自己的文化程度又不高。試想想：一个背着六个人的家务工作，又沒有讀多少書的家庭妇女怎样去学哲学呢？

家事多，文化程度低，这两个特点，几乎是我們街坊妇女共同的特点。正因为这样，談起学哲学，大家都感到：第一，沒有時間；第二，不知哲学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不愿学。我在未学哲学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和許多街坊妇女不同的是：除了家事多和文化低之外，因为我是居民委员会主任，还要搞街坊工作；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好，少年生活的困苦，使我貧血，容易感到疲劳。这就給我带来了比一般街坊妇女更多的困难。

今年七、八月間，全国工农业和各方面工作都

在大跃进，街坊工作也随着加重。要搞民办工业；要扫除文盲；要办托兒所；要办街坊食堂；要做好街道的清洁卫生；要搞好治安工作；要宣传勤俭持家，帮助銀行办儲蓄；工作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沒个完。工作、开会、听报告，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忙来忙去。因为实在太忙，自己思想上便苦悶起来，总想松一口气。

这种苦悶情緒，是我几年搞街坊工作所沒有过的。过去，我的街坊工作搞得很好，受过各方面的表扬；我的丈夫也常常称赞我，鼓励我，說我的家务和街坊工作都做得好，我自己的劲头也很大。但在今年七、八月間，我开始泄气了。觉得天天要跃进，日日要苦战，不知何时有一个止境。又觉得要搞好街坊工作，就不能搞家务工作，两者不能兼顧。我这时真是又急躁，又苦悶。

九月上旬，街坊工作更加紧张，我的思想包袱也更沉重了。在这当兒，我們堤东区成立了紅專学校，由居民委员会主任和街办事处工作人员担任班主任。班以下設組，每組設組長。目的是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学毛主席的著作、学哲学。我被推为班主任兼組長。

最初接受这个任务时，我感到很困难。自己想想：为什么要学哲学呢？我們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的街坊妇女，学了哲学有什么用呢？沒有学哲学，我們还不是一样工作和生活嗎？現在已經忙个不了，那有功夫来学那和生活不相干的哲学。我虽然沒有把这种想法对別人說出来，但在接受任务的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对我的爱人哭了起来。

我的爱人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当时就指出我的錯誤，并劝我无论如何得挤出時間去学哲学。我心里还是半信半疑。便帶着一种听一听哲学报告也好，看看哲学是什么东西的心情去学第一課。

第二天，我背着一个最小的孩子去上哲学課。輔導員首先向我們講两种世界观和毛主席的矛盾論的主要精神，他說得很通俗，又結合实际，我越听越感到兴趣。原来，世界观只是人們对世界的一种

总的看法，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矛盾存在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中，我们的街坊工作和家务工作之间也有矛盾。哲学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着的。

听完了课，我抱着小孩一边走一边想。当夜，我想了一夜没有睡。辅导员说学哲学要联系实际，于是我想到解放前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和剥削我们；玩弄妇女，不把妇女当人看，他们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要是他们的世界观胜利了，我们妇女还能求得解放？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全民办工业，办托儿所，办食堂，扫除文盲，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我们自己、为子孙万代谋幸福。我们现在辛苦一时，幸福万代，有什么不好呢？想到这里，我知道我之所以产生苦闷和想松一口气的偷闲思想，就是我的世界观不正确。我拿两种世界观所得到的两种结果对比一下，就问自己：你要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侮辱戏弄，还是要托儿所、食堂等等呢？这一问，问题就明白了：应该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跟着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积极奋斗。现在工作忙，家务重，的确是一个矛盾。我们要革命再革命，就不能存在想松一口气的偷闲思想，现在自己有这种泄气的思想，这表明自己要求自己还不够严格，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自己还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一点。可是家务重，身体不好又影响情绪和工作，这个矛盾总得设法解决。我又想到，比如现在要发动街坊妇女搞生产，办工业，她们也是会被繁重的家务拖住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就是认真多做工作，把食堂、托儿所等等办起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样才能真正减轻街坊妇女的家务劳动，使大家腾出时间来搞好生产和社会工作。我这样想，就觉得党号召我们办公共食堂、办托儿所、办民办工业等等，都是十分正确和需要的，自己的干劲也就更加足了，思想上的问题是解决了一些。但在这些工作搞起来以前，自己是居民干部，总得先带头出来搞工作，家务劳动和社会工作忙的矛盾仍得解决好，不然要搞好这些工作，仍然是有困难的。怎样才能腾出时间来呢？这是彻底解决我的思想苦闷和实际困难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我这样考虑问题时，就觉得过去思想苦闷，乱做一团的烦恼逐渐变得清楚和容易解决了，原来这就是辅导同志所说的抓住主要矛盾了。过去的许多苦闷和烦恼，主要问题就出在家务重和社会工作多和忙的矛盾上，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于是我积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如请邻居代我照顾一下小孩，自

己把家务安排得好一些，不要把煮饭时间安排在要去工作的时间等等。这时，第一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也和我以前一样，因为感到家务重和工作忙而苦闷，到我这里来问如何对付这个局面，甚至哭起来。我便给她分析这种困难，指出如果能把家务繁重与社会工作太忙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就能把这种局面突破。于是我们便一同商量，把第一居民委员会和第二居民委员会的许多工作，考虑它们能合并起来办的，就合并起来，如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都是合并起来办。这样，就避免了两个人同时去办一件工作的浪费人力现象，大大减少了工作的忙乱现象。现在公共食堂办起来了，我就带头参加公共食堂，繁重的家务劳动已经大大减轻，思想苦闷和实际困难都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使我们两人都能满怀信心地积极搞好街坊工作。

随着街坊工作的开展和街坊群众的普遍参加学哲学，在短短的十多天，我们街坊妇女的思想也有了大跃进。比如过去我们街坊有一个“石敢当”，大家都把这块石头当神来敬，要是谁去移动这块石头，大家就一定有很多疑惧。但是经过学习哲学，特别是听了两种世界观这一课后，打破了对鬼神的迷信，现在我们把这块“石敢当”搬掉，大家都没有意见。又如过去我们这里有一堵砖围墙，是用来挡风水的，大家都不敢动这堵墙，但是现在党号召我们大搞炼钢炼铁，我们没有砖头砌高炉，大家便动手把这堵墙拆掉，用它的砖来建筑民办工业的高炉。这些行动，在我们街坊来说，是件很大的事情。如果在未学哲学以前，真不知会闹成个什么样子，但现在不仅大家不会闹意见，而且大家都说应该这样。我觉得大家学哲学后，自己思想固然是通了許多，街坊工作也好做了許多。我体会到了学哲学的好处。这样，我们一面学哲学，一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寻求矛盾，把主要矛盾找到，首先设法解决它。做得既有条理，又有步骤。工作没有减少，但时间却好象多了出来似的。目前，街坊清清洁洁；托儿所、食堂办了起来，妇女们在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又因为搞起了民办工业，现在不论妇女和儿童都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大家的收入增加，生活也更加美好了。

从这里我深深地感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思想的伟大，它象太阳一样照耀着每一个角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使我们得以初步掌握哲学这门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我决心继续不断地学习哲学，继续不断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赵一之记）

# 南共修正主义者国家論的反动本質

王致远

南共修正主义者反动的国家論，集中地表现在南共綱領草案中。这个修正主义的綱領用反动的超階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竭力美化資產階級專政而丑化无產階級專政，其实質是要取消无產階級革命和无產階級專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制造思想上的混乱，解除无產階級的武裝，以維護帝国主义腐朽的反动統治，为帝国主义服务。南共修正主义者的反动国家論是南共修正主义基本內容之一，也是南共修正主义者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問題。为了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为了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學說，必須揭露南共修正主义国家論的反动本質，彻底粉碎这种謬論，并消除其一切有害影响。

## 一

任何国家都是階級的專政，这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碼常識；資產階級国家是資產階級压迫、剝削工人階級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任何詭辯所改变不了的事实。然而南共修正主义者却竭力为資產階級政权擦脂抹粉，企图把資產階級專政这个丑惡的魔鬼化裝为美丽的女神，这就明显而突出地暴露了他們修正主义的实質。

首先，南共修正主义者掩盖資產階級国家的階級实質，把它美化为“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調节者，”“置于社会之上”，既“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又“限制工人階級作用”，甚至把資產階級国家管理經濟的职能，說成“社会主义因素。”这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因而也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如果对抗性的階級矛盾可能調和，国家就沒有需要，也就不会出现了。資產階級国家虽然形式很复杂，但其本質都一样是資產階級專政。尽管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

千方百計愚弄劳动人民，企图使他們相信資產階級国家是什么“超階級的”、“全民的”、“民主的”国家，但是資產階級国家是剝削者的国家这个本質却始終无法掩盖。现代資本主义国家保护資本对劳动者的残酷剝削，保証垄断資本集团获得高額利潤，无微不至地維護有利于資本活动的“社会秩序”，为它获取高額利潤創造条件，忠心耿耿地为資產階級服务；对无產階級及其他劳动人民則实施殘暴的鎮压，禁止劳动人民反資本的活动，动员所有国家机器来和工人階級作斗争。而当虛假的民主自由破产了的时候，就不惜使政治法西斯化，露出猙獰的眞面目来。最近法国戴高乐的上台以及法国政治的走向法西斯化，就是明証。在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說資產階級国家是階級关系的調节者，是对社会各階級一視同仁的超階級的机构，这完全是胡說八道。

南共修正主义者不但竭力掩盖資產階級国家的階級实質，而且还毫无根据地说：“資產階級国家日益监督資本，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财产的权利，并剝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濟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这样說来，資產階級国家竟然把枪口从劳动人民方面掉轉过来对付自己，資產階級国家对資產階級自己竟实行起專政来，这岂不是天大的奇談！事实上，資產階級国家是資產階級的忠实看家狗，是劳动人民凶惡的敌人。它的任务就是保护資產階級免于遭受监督、限制和剝夺，对任何要监督、限制和剝夺資產階級的言論和行动予以打击和鎮压。美帝国主义在国内制訂了一套所謂“保卫国内安全”的塔虎脫——哈特萊法、麦卡伦法和“共产党管制法”；在国外为了維護垄断資本集团的利益，到处进行侵略。这不正說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护垄断資本集团不受监督、限制和剝夺，已瘋狂到什么程度！

南共修正主义者美化資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无非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反动統治，因此，在分析資產階級国家的性質和职能之后，他們就恬不知耻地提

出：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工人階級不需要革命，也不需要打碎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只要對資產階級国家機構“不斷施加壓力”，在這種国家機構中“取得決定性的影響”就可以“將国家的機器變為社会的公仆”，“保證社会主义的發展。”從這些謬論里面，難道能夠嗅出一点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嗎？

還在1871年巴黎公社時，馬克思即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主要把它毀壞。”（見馬恩文選兩卷集第二卷馬克思致留·庫格曼）至187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原理，並把它作為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修改。（見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列寧對這一思想更進一步加以發揮，並找到適應無產階級專政的国家形式——蘇維埃來代替已被打碎的資產階級国家機器。為什麼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機器？因為不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機器，就無法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無產階級的历史任務是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無產階級革命是把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專政轉變為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而不象历史上換朝代一樣，政權從一個剝削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剝削階級手里。無產階級既然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既然要動員廣大人民來管理国家大事，就不能襲用剝削階級用以統治大多數人的国家機器，而必須打碎它，創造新的国家機構來代替它。因為舊的国家機器其性質和任務與無產階級国家的性質和任務根本不相適合。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機器這一原理，四十多年來，已為蘇聯、我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實踐所証實，為什麼南共修正主義者竟提出這種顯然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謬論來呢？其實這不是什麼“創造性的發展”，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其目的是要腐蝕資本主義国家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解除他們的武裝，使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可以和平走入社会主义，可以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資本主義国家的工人階級听信南共修正主義者的話，按照他們的謬論去做，那帝國主義就可以苟延殘喘，帝國主義的国家機構就可以保存下來了。這樣，他們給南共修正主義者的大筆獎金也就不是白費的了。

## 二

南共修正主義者既然美化了資產階級專政，就

必然丑化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用惡毒的語言攻擊社会主义国家，說什麼“国家機器管理經濟和整个社会生活会導致管理的日益集中，”“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着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即社会主义关系發展中的官僚主義和官僚国家主義偏向。這些現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經濟機構中上述傾向的直接產物，它使這些機構由社会的公仆和執行人變為社会的主子。”“在這樣情況下，在希望成為社会生產資料主人的勞動群眾和作為一切壟斷者的国家之間，社会主义按勞取酬原則和官僚主義經濟特權之間，發生了對抗性矛盾。”這種“国家極權主義的官僚主義是過渡時期最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危險。”“使社会发展停滯不前”。這種論調的惡毒和荒謬，和我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攻擊和詆毀實質上是同一種調門。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所以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為了保衛国家免受外來侵略，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也為了進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解決社会主义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過渡時期是一個充滿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历史時期，在這個時期里，資本主義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間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必須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決。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發展的規律是時緊時松、一起一伏，即使給予敵人以幾次沉重的打擊，敵人的勢力大大削弱，階級鬥爭仍未熄滅，有時仍會表現得激烈尖銳。而在基本消滅了剝削階級以後，在政治上、思想上仍然需要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徹底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否則，社会主义国家還不能算真正鞏固。匈牙利事件就是慘痛的教訓。由此可見，在過渡時期，任何要削弱甚至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和做法都是極端錯誤的。南共修正主義者借口發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甚至立即要国家消亡，這實質是要工人階級讓反革命勢力復辟，以配合帝國主義對社会主义国家的顛復活動。我們知道，民主與專政兩者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矛盾的統一。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动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專政是用來對付敵人的，不是用來對付人民的，怎能說專政會限制民主的發展？而且民主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世界上也只有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民主，離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社会主义民主”，這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加強對敵人的專

政，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就有可能实行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我国在彻底镇压反革命之后，在整风时期，人民内部出现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还因为需要对旧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风平浪静的工作，而是一场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根据阶级路线和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必须国家统一规划与集中的领导，这里面也充满着复杂的斗争，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艰巨的复杂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

南共修正主义者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机构领导经济建设事业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这是一种恶毒的攻击与诬蔑。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沾染有官僚主义作风，是旧社会的遗毒。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而且恰恰相反，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我国在去年以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下放权力、下放干部、干部参加劳动、领导深入下层等措施。这样就使官僚主义作风大大减少，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情况的出现，正与党和政府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使工农业生产出现大跃进同时，难道这能够说国家管理经济，就产生官僚主义么？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是不是官僚主义就没有或者少一些呢？其实不然，根据“南共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人的一封信”所透露的情况来看，他们那里，官僚主义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这封信供认：“权力下放、特别是物资和财政权限的下放，加剧了地方和自治机关的以及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的危险性。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加上忽视整体利益的倾向常常是与官僚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在地方组织和企业的个别领导人员或在部分领导人中，这样的倾向已经牢牢地生了根。”“在许多企业中，…领导人员…违反自治机关的意志或以他们形式上的批准来通过独断独行的决议，压制批评。当工人们

批评上级时，他们就被调去做别的工作或直截了当地被开除。”据统计，仅去年一年，这样被开除的工人就达三万余人，占南斯拉夫全国七十万工人的4.3%。此外，特权和徇私偏爱现象也很严重，如“粗枝大叶地通过决议，让个人或团体到国外去旅行……；订购不必要的小轿车，供个人使用；赠送不必要的往往是沒有理由的礼物；过分地和非法地使用日常津贴；随意挥霍社会基金举办各种庆祝会……”等等。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不懈地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官僚主义作风在逐渐减少，而实行“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则官僚主义现象仍然很严重，这就从事实上否定南共修正主义者的论据。由此可见，南共修正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南共修正主义者不但借口民主，反对专政，而且借口民主，反对集中。其实民主和集中也是统一物中矛盾的两个侧面。片面强调民主把民主说成绝对的，也和片面强调集中把集中说成绝对的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不是专制制度的集中，而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不是极端的民主，而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艰巨而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没有国家统一集中的领导，要迅速顺利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经济建设，使国民经济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正是社会主义工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一年多来实行工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洋并举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使工农业生产出现大跃进局面，创造了許多世界前所未有的奇迹，正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使统一领导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结果。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如果是正确的，为什么经济情况很不好，到现在还要依赖帝国主义过活呢？正因为南斯拉夫反对国家管理经济，对旧经济不进行彻底的改造，经济中保留了許多资本主义因素，所以成为今天南共蜕化变质的经济基础。

在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南共修正主义者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经济时，就美化为“社会主义因素”竭力加以赞扬；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管理经济，则诬蔑为“官僚主义”、“极权主义”，并把它夸大为对抗性矛盾，说成是过渡时期的主要

危險？他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講話，還不明顯麼？說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官僚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其實質不是要我們放鬆兩條道路的鬥爭嗎？

### 三

南共修正主義在丑化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得出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而且必須是特殊形式的國家，即日益消亡的國家。”因此，“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政權鞏固後，國家逐步消亡的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了。”同時，南共修正主義者認為黨領導國家機關“就會使得黨政不分，使得黨組織官僚主義化。”為了“引導社會制度向社會主義民主方向發展”，共產黨應“自覺地把一系列的政治職能移交給社會和它的各種機關。”這實際上就是要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取消黨的領導。

毫無疑問，所有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都認為將來國家是要消亡的，問題是國家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條件下才會消亡。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論述到這個問題時，認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被徹底粉碎、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階級不復存在，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時，國家才會消亡下去。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指出：“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在回答要不要消滅國家權力時，他說：“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借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的利益。”可見，只要在国际上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還有階級存在的時候，國家就還不會消亡，也不能消亡。南共修正主義者把國家消亡作為社會主義當前直接的任務，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歪曲。實際上如果按着這樣做，才是真正的危險！試想在當前國際形勢緊張，帝國主義到處進行戰爭挑釁的時候，在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面前，要我們的國家消亡，這難道不是要我們解除武裝向帝國主義投降麼？

南共綱領草案在提到國家消亡問題時，竭力攻擊斯大林，說他在這問題上作了實用主義的修正。我們且看實際上究竟是誰修正了馬列主義。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

的總結報告中提出，有人問：蘇聯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國內已沒有什麼敵對階級了，再沒有什麼敵對階級了，為什麼不促使國家消亡下去？或者問：蘇聯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着，為什麼不按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促使國家消亡下去？斯大林認為：在蘇聯進入共產主義時期，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已經消滅，而被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那國家就會消亡下去。但如果那時資本主義包圍尚未消滅，而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鏟除，則國家還會保存下來。斯大林這一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學說。南共修正主義者不管時間、條件，不顧國際環境如何，主張現在國家就消亡下去，這才真的是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

其實，就南斯拉夫內部情況來看，南共修正主義者實際干的却另有一套，即專橫地在加強他們的國家機器，實行鐵托個人的和小集團的統治。他們對工人濫施懲罰，對於贊同蘇聯政策的真正共產主義者，大肆逮捕，在國際上開展反修正主義鬥爭以後，鐵托集團對於反對他們政策的人，大規模進行逮捕。這些事實，是對鐵托集團“國家消亡論”的諷刺。

南共修正主義者要取消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要取消黨的政治職能，把黨作為“思想因素”，這也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的謬論，是典型的叛徒聲音。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無產階級最高的組織形式。黨應該和能夠領導一切部門。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為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所証實的普遍真理。說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作用會使黨的組織官僚主義化，會影響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這是非常荒謬的。我國的事實證明，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領導，把一切工作都置於黨的領導下，使一切工作都政治掛帥，才使黨更密切與群眾的聯繫，才使群眾的積極性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才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廣泛發揚起來。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一切。南共修正主義者這種謬論，其實質是要取消黨的領導，和我國資產階級右派的謬論沒有兩樣。

綜上所述，可見南共修正主義者的國家論是異常反動的，它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毫無相同之處，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不正恰如其分，一點也不冤枉的麼？



# 短论与随笔

## 談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作风

汪德亮

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同时又是伟大的教育家，这就容易被人忽略。许多人以为只有做过学校教师或者写过教育学教科書的人，才会成为教育家。其实，如果我们从教育工作的角度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他的革命事业，就会認識毛主席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实践家。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运用在中国教育实际的理論。毛主席的著作，無論有关思想、政治、軍事以及文艺的言論，处处都流露着对同志、对群众的真挚感情和誨人不倦的精神。他感人深，影响大，原因也在于此。他正是以这种精神来传播真理，推动革命。所以更正确地說，毛主席是一位政治教育家、思想教育家、軍事教育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后，頗有一些感想和体会。

社会不断发展，革命不断前进，教育也不断革新，除了我們思想上必須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外，如何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我們教育工作者一般的毛病是自以为工作方向正确，又有一片热誠，教人没有什么問題了。其实不然，毛主席說：

“不仅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他在許多场合，都教导我們要采用实际而具体的工作方法、耐心說服的方法和摆事实說道理的方法等等。应该注意的是：运用这些方法的成功关键，在于深入群众。我們說話之所以不能服人，或者有时主张之所以行不通，归根到底，就是脱离群众，不能实事求是。毛主席教导我們“向群众学习，向环境学习”，真是一把寻求真理的鑰匙。我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都会感觉到毛主席的每一次講話，無論对青年、对工人、对干部、对士兵，总是能够

抓住問題，提出要求，具体問題，具体解决。例如他在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青年要求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一九五四年視察軍艦时，曾对士兵說：“过去你們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們爱山、爱土；今天你們在水上，大家就要爱軍艦、爱島、爱海洋”。都是那么明确通俗，精簡扼要。这不仅是修辞上的艺术，而且是經過深入了解，真知灼见，然后概括出来的。我們教育工作者，天天对青年講話，如何才能說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毛主席給我們做出了榜样。

毛主席对于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风格和道德品質是非常重視的。但是，他的言論，从来不采用說教的方式，而是在他表扬的典型范例中，讓我們学习。他推崇徐特立同志“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精神；他称赞鲁迅的骨头硬，称他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紀念白求恩医生，認为他具有“对工作的极端的責任，对同志人民的极端热忱。”……这些評語对全国几百万的人民教师、文艺工作者和医生等，都起着莫大的教育作用，讀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記的。

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我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来从事革命的教育工作，有极大帮助。早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就討論到农村教育問題。当时的“洋学堂”就是照洋人常规办的学堂。清末这样办，民国也这样办；城市这样办，乡村也这样办。名称、年限、程度虽有不同，精神實質都是一样。毛主席首先指出，农民并不欢迎洋学堂，因为不合农民的需要。资产阶级教育家还說群众不能办教育，只能受教育。但是革命形势一变，“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

便开始了。……不久時間內，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还是一句廢話。”毛主席就这样給了当时的“教育家”当头一棒！最近我們看見工农业大跃进促进了文化教育大跃进的許多事实，更完全証實了毛主席卅年前的預言！

一年来，农村新成立的紅專大学、农业中学、业余学校等，与我們从書本知道的，大不相同，可見办教育的确不能迷信。

毛主席很早就教导我們：革命的主力軍是工农。那么，帮助工农动員起来，組織起来，提高起来，就是政治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这說明教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教育的内容、制度必須随着革命的中心任务，而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教育才能起应有的作用。例如在抗日时期，毛主席对国防教育的指示，就是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又說“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課程，实行以抗日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課程。”抗日战争胜利了，也是教育改革胜利了！目前我們又进入一个新时代，全党全民建設社会主义，干劲冲天，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如果看不见时代的前进和要求，又会喊“不正规”了。“劳动影响学习”了。我們的思想必須解放，不要被“常规”框住，动弹不得。

毛主席的热爱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寄予无

穷希望，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的。毛主席对中国的前途，一向抱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終相信革命一定成功，而革命成功一定要依靠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他說：“自五四以来中国青年就起先鋒队作用”，这对青年是多么大的鼓舞！我們教师，工作前进的最大思想障碍，正是对青年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很容易強調青年表面的缺点，如沒經驗、冒失、粗暴等等，因而不仅不学习青年的朝气，反而阻撓青年前进的勇气。这是一个不可原諒的錯誤。人民教师如果忘記了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或看不见青年人所具有的勇气、朝气等好品質，那么，对教育工作就会失却信心和乐趣，最后可能变为教書匠，以至于做逃兵掉队。事实上，革命卅多年来，無論走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生產上，青年在党的领导下，貢獻都是很大的，流汗流血都是最多的。最近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下，全国各大学教学改革的主力，还不是依靠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么？許多大学生甚至已經編写出專書和各种教学大綱了，这都是青年人勇敢能干的最好說明。

去年毛主席对留苏学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归根到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鐘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毛主席的話，对青年的前途充滿着无窮的希望。只有伟大的教育家，才能发出这样震动青年心弦的声音，才能作出这样推动青年积极性的号召！

## 一定要繼承革命大学的光荣传统

杨友吾

最近，中共广东省委指定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在本学年內增設中学政治教师專修班，并指定各專区、县市委按分配名額选送政治觉悟較高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机关干部、轉业軍人、优秀小学教师和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入班学习，这是繼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办革命大学的光荣传统，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个好办法。

在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面前，用办革命大学的精神和方法办学，簡言之，就是：第一，必須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針、政策

和学习原則、方法；第二，多請有長期革命斗争經驗的党政軍各方面的負責同志講課；第三，必須坚持做什么学什么、从学生的工作（未来的中学政治教师）、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教学，边学、边練、边做；第四，校內学习必須与社会活动、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群众工作与劳动生产；第五，发扬教学中的群众路綫，师生互教互学，充分發揮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六，自始至终地进行严格的思想政治工作，強調集体主义教育，保持紧张的学习生活，提

倡忠誠團結、勤勞朴素的作风等等。

上述办革命大学的办法，在解放以后的和平环境中也在某些学校不同程度地繼承了下来，今天用这种办法办学有没有好处？我們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特別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学校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需要有政治素質优良的教师；同时，在全民整风以后，中学政治教师的任务，已不是仅仅教一門課和兼一个班的主任而已，他必須成为党的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有了这样一个革命大学，选派优秀的党、团员参加这一学习，就可使参加学习的人在思想和业务等各方面都有一个基础，而学校也就能在一定時間內，对学员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按学员的实际斗争經驗編班，要求学员們經過半年或一年的学习和鍛煉之后，在政治上成为左派，即立场坚定，坚决服从党的領導；并具有明确的階級观点，集体观点与群众观点，劳动生产观点，辯証唯物观点；能在自己思想上和学校工作中拔尽白旗，插遍紅旗，兴无灭資，坚持学校教育工作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等。經過学习的学员到了中学政治教师的工作崗位上去，就能够坚持从世界政治形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社会政治运动、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針政策、以及学生的思想等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則进行政治課教学；要求他們能胜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做好平时的思想工作，領導学生貫徹勤工俭学的方針；要求他們能够做好中学党組織的政治工作助手。根据培养目标，以做什么学什么为原則，在政治理論課方面，学习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党的历史与毛主席重要著作；哲学。加强政治教师思想教育。学习这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改造思想；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他們打好做一个中学政治教师所必需的理論基础。还有，在教育理論課方面，必須学习党的教育方針、政策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心理学基本知識；中学政治思想工作与政治課教学的原則与方法等三項課程。

为了貫徹教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相結合，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的方針，除了課堂教学外，还要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如下活动：第一，体力劳动：除每天早飯前、晚飯前輪流劳动一、二小时，每周劳动一天外，一年制全期再集中劳动四

周，半年制全期再集中劳动两周。第二，参观（到农村和工厂）和见习（到中学），次數視教学需要而定。第三，教育实习，一年制毕业前到中学实习四周，半年制毕业前到中学实习三周。第四，請校外有关部門做各种与学习有关的專題报告和先进經驗介紹（配合教学进行）。第五，在毕业前进行一次系統的思想总结与全面鉴定。

在教学中应采用整风的方法。一般在講一个單元或一个專題时，首先印发学习提綱或講稿式的学习資料，接着就做学习启发报告，再指导学生深入鑽研有关的党中央的政策、指示与毛主席重要著作。在听启发报告和鑽研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鳴放，然后归納出若干較大問題来組織学生展开辯論，再由教师逐一做总结。最后則要求学生結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深入检查批判，以达到提高和改造思想的目的。

在教学中，还应做到边学、边練、边做。每学完一門課程或一个單元，即以小組为單位进行备課和試教，以逐步掌握在中学教政治課的实际知識；平时要求学生輪流担任撰写时事广播稿或在本班、本組作时事报告，此外还要求学生們輪流担任班的党、团、生产、通訊等領導和具体工作及其他各項社会工作，以逐步培养和提高他們的实际工作能力。

貫徹上述教学方針，完成上述教学任务，必須以树立革命的学风来保証。即：思想共产主义化，理論实践一致化，学习（在教工方面提工作）劳动战斗化，生活作风工农化。強調要思想上政治挂帅；作风上艰苦朴素，紧张活泼；行动上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并特別強調养成集体主义习惯。对学生如此，对教学人員和班干部就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做到教課从实际出发，定期到人民公社、工厂、和中学去学习、体会和实践，以切实克服教条主义的教学傾向。为了随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情况，兼班干部的教学人員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政治理論課教学人員要在本院做好党委政治工作的助手，即根据具体条件分別担任党、团、工会組織的宣传工作，輔導教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策，以及負責院刊編輯、时事广播等工作。尤其重要的是教学人員必須在一切行动上首先作学生的好榜样，处处以身作則，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

王 琴

干部理論学习如何才能打破过去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的“常规”，这在今天全党全民学理論的形势面前，确实是应该重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理論联系实际是突破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的正确方針。但是要正确地贯彻这条学习方針，还需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总结良好經驗。江門市检察院干部哲学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經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例子。

这里首先要解决学习的目的性这个問題。如果学习的目的不明确，变成为学习而学习，为理論而理論，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正确地贯彻联系实际的方針，不可能做到真正地从实际出发；只能以原則套例子当作联系实际。例如他們最初在討論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就以“地是怎会变的？”“地的岩漿在变”来说明，并且以为这就是理論联系实际了。即使是对检察部門的当前工作有些联系，也只是順便涉及，表面上的牵扯，沒有从精神實質、发展规律，从立场观点来联系。事实上，这也是教条主义对待理論联系实际的表现。其結果就必然是学习沒有收获，情緒低落，思想疲沓。相反，如果端正了学习态度，明确了学习理論是为了明确立场观点，解决实际問題，批判了为学习而学习，为理論而理論的思想，就有可能掌握和正确贯彻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江門市检察院哲学学习小组由于领导和干部都能認識学哲学、学理論是为了明确立场观点，解决实际問題，所以就能在学习中针对該單位干部在思想和工作上普遍存在的五个主要問題进行討論。他們有些同志結合着哲学学习，检查自己过去調查貪污案件的工作时说：“我写这份貪污調查报告，是分析客观原因多，对貪污的主观原因講得少，现在看来，內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制度不健全等外因只是給貪污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这样，他們觉得学哲学的确能提高实际工作能力，端正观点，帮助实际工作。又如他們检查了过去审查批捕案件时，不考虑時間地点，只要情节差不多，就照老办法处理的这种不懂规律和策略的工作中的盲目性。这就大大加强了他們观察問題的辯証唯物观

点；大家都感到学哲学对自己帮助很大，因而兴趣很高。这就克服了过去那种生硬的，原則套例子的所謂理論联系实际的現象。正因为学习目的性明确，他們能把学哲学、学业务和研究工作統一起来，既能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真正联系实际，提高理論認識，又能做到业务工作与学习理論不矛盾而且能增加学习時間。

其次，是联系的方法問題。找到了可以作为出发点的实际問題，如果不懂得正确的联系方法，还是不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必須从分析理論所由发生的实际来掌握理論的精神實質，具体地运用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分析解决問題。例如当联系到一件貪污案件时，如果簡單地只从理論出发，說內因是决定的条件，官僚主义和制度不健全只是外因等等，这很容易变成簡單化，因而还是不能很深刻地理解辯証法关于內因与外因的关系的理論。必須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个具体的貪污案件，考察和分析貪污犯的一貫思想表现和生活作风，同时也考察和分析那种使貪污犯有机可乘的制度的不健全所在，把这些結果与其他的人物和环境作比較，还要站在正确的立场来給事件作出相应的結論，这样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与研究，才有可能深刻体会辯証法关于內因和外因的关系的理論，才不致于流于簡單化的联系实际和生吞活剥地学理論。这样的联系方法，是理論与实际取得了內在本質的联系的方法。

江門市检察院哲学学习小组之所以能在学习上取得比較良好的成績，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外，还因为他們在学习过程中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上述問題。因此，在学习中他們一方面能够正确理解理論与实际工作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当前党的政策文件，能进一步深入体会它的理論根据，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

毛主席指出，理論联系实际，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是“矢”，中国革命实际是“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須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很恰切的比喻，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則指示。江門检察院干部学哲学的方

法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有的放矢”因此取得了成績。

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把客观存在的问题，事物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和自然的；即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毛主席把人类的知識，概括为生产斗争的知識与阶级斗争的知識。他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把知識分为两大类，这就提供我們解决什么是“实际”的問題。但

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知識問題和社会知識問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实际的問題，象上面所列举的关于“地是怎样变”的問題，虽然也是一种自然知識的实际問題，但显然不是一个检察工作干部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問題。因此，当我们說“从实际出发”，就不能不和学哲学的目性联系起来。否則，便成为目的不明地用原則套例子的“普遍联系”，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从实际出发”，实际上还是脱离实际的。



##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一書的几个問題

何立

杨源时的“談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增訂本）一書<sup>①</sup>。对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党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基本政策和主要措施等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和基本正确的論述。但是我認為也包含一些重大的缺点和錯誤。这主要地表现在对党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主要傾向的估計，和对知識分子思想、政治情况的估計上；此外，还表现在对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某些錯誤观点的态度上。

关于党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主要傾向問題。著者說：“目前”存在的两种傾向，“主要是宗派主义傾向”（第12頁）。这話虽是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时說过的，但那是1956年1月，而該書却是在1957年9月出初版，1958年1月增訂的。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党在同自己队伍内部的“左”的和右的傾向进行两条战綫的斗争中，在不同的时期里抓住主要的一方面，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什么是主要的，既不能粗率地随意地判定，也不能一經判定之后，就一成不变，以为永远如此。1956年初，党中央指出，当时党在知識分子工作中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义，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那时候，肃反运动已經深入展开，社会

主义革命高潮已經形成，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党内許多同志由于思想落后于实际，对这些新的形势和新的变化認識不足，因而在知識分子工作中发生跟不上形势要求的缺点，并且主要地表现为宗派主义的傾向。正是党中央的这个正确指示迅速地扭轉了这种情况，使知識分子工作得到了新的开展。自此以后，两年之間（到我們討論該書增訂本出版时为止），我国国内和国际上又经历了一系列新的事件、新的变化，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工作也不可能不出现新的情况、新的問題。党内对知識分子工作中的缺点主要表现为宗派主义傾向这个情况是早已有了变化了。右派的进攻和反右斗争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1956年下半年以来，直到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为止，知識分子一般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右傾表现，是相当严重的；而党的知識分子工作的缺点方面，右的傾向比起宗派主义来也已占了上风。在右派全綫进攻的前夜，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

<sup>①</sup>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就曾指出：“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因此很顯然，在該書的出版和修訂期間，仍然作出“目前”“主要是宗派主義傾向”的估計，是不符合實際，並可能引起混亂的。

那末，是不是說，在反右鬥爭以至整個的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之後，宗派主義已經或將要成為知識分子工作中的主要傾向呢？該書並沒有這樣指出問題，也沒有從這方面去求解決。著者所列举的一些宗派主義的表現都沒有涉及這樣的特定的條件。所以這個問題，在該書是找不到回答的。對於這個問題，這篇短文也不打算作具體的回答；這裡只想指出：要回答這種問題，不允許粗率 and 隨意，或硬套什麼公式，而必須實事求是。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範圍（地區、單位）內，可能有不同的情況；而當着在全國（一定地區也一樣）尚未形成（或尚未能斷定其必將形成）一種共同的主要傾向時，就不能勉強地去找它、去下結論。

對在知識分子工作中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的分析中，批評了有些同志“粗暴地對待有歷史關節但不屬於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第19頁），有些同志對別人的缺點錯誤“挑剔過嚴”（第13頁），有些同志同人家相處時“隔着一層很厚的板壁”（第19頁）；所有這些，都是應該批評的。但是完全沒有提到：對有歷史關節的即使後來查明不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審查的必要性，知識分子對思想改造抱着種種抵觸思想的錯誤性，在黨同知識分子的不正常關係中知識分子方面所負的責任。誰要是回憶一下右派向黨進攻中在這些問題上的借口，以及考慮到正是右派在這些問題上所極力造成的片面印象，使他們曾經取得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同情；誰就會理解，這種片面性，會產生怎樣的不良後果，並且在取得了反右鬥爭的經驗之後犯這種毛病是怎樣的不應該了。

其次，談談關於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情況的估計問題。作者說：知識分子“在政治認識上和思想意識上都存在許多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但是解放以後，……這種情況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第19—20頁）。這種估計，我認為也是不正確的，按照這種估計，似乎知識分子政治上思想上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已經基本上沒有了，或者很少了。不但在反右鬥爭和整風運動中所暴露的大量事實證明在反右鬥爭和整風運動取得勝利之前，這種估計不符合事實；就是反右鬥爭和

整風運動剛剛取得勝利之後，這種估計在事實上也是不正確的。即使根據該書所列举的知識分子的進步一面的六種表現，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或者有人說，這種估計也是可以在周恩來同志的報告和其他文獻里找到依據的。但是只要細心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區別來。周恩來同志在報告中講到知識分子政治狀況的巨大變化，人民日報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1957年4月6日）中也講到“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是他們指出了，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同他們在政治和社會地位上的變化並不完全相適應。據我的了解，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方面，而不是他們的“政治認識和思想意識”方面，不是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和世界觀方面。當然，在這些方面，也是有變化的，尤其是經過反右鬥爭和整風運動，變化更大，但並沒有達到“從根本上改變了”的程度。如果在這些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了，那末著者在另一個地方所作出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就其根本立場來說，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一正確論斷（見第57頁），豈不是自相矛盾了嗎？

著者又說：“……左派分子，也就是真正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23頁）；在另一個地方，又說：“真正算得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只占少數，就是說，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還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因此，這部分知識分子，就其根本立場來說，還不能說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使他們拋棄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工人階級化，還需要經過艱苦的鬥爭”（第56—57頁）。在這裡，著作對於占大多數的處於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的估計是正確的，但是對於左派分子的估計，則是不完全適當的。

左中右是政治分野，其基本依據是人們的政治立場，而不是思想意識和世界觀。而為了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為真正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却必須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當然政治立場同思想意識和世界觀有着密切的聯繫，但兩者也不是等同的東西。左派分子一般地已具有堅決的社會主義立場，亦即在政治上說，基本上已同工人階級站在同一的立場上，因而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在思想意識和世界觀方面，他們一般地對自我改造已有了較高的自覺，已經明確地承認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並且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一部分已經

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亦即已经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另一部分，则世界观的转变还只是开始，他们在思想、观点（包括一些涉及政治问题的观点在内）上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一部分，在目前阶段上，就其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方面说，只能是接近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需要继续进行本质的改造，以便完成世界观方面的转变，才算是彻底的工人阶级化，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的工人阶级政治立场巩固起来、完全起来。最近一个时期在高等学校中所展开的学术批判的斗争中我们不难找到实例来证明这种估计。总之，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左派，一般地说来，可以算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不必也不应一律强调为“真正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全面论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时候，指出上述这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合乎实际的。但是该书对这些完全没有提及，而笼统地强调左派分子是“真正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且说成似乎只有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中间分子才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也只有“这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彻底工人阶级化”才“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而所有左派分子则似乎已经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已经“彻底工人阶级化”了：这当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和不利于促进一部分左派分子继续进行自我改造。

最后，谈谈该书的另外一个缺点，即对于一些妨碍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思想、观点，缺乏必要的批判。这除了上面谈头一个问题时顺便提到过的例子之外，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在第29——30页上，该书有一段话谈到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在这段话里，著者对“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思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实质毫无批判，反而用一种肯定的口气，把它解释为“他们非常重视工作中的相互关系”，并且毫无保留地用这句话来说明解放后知识分子同党和人民的关系，似

乎这句话就是这种关系的确切反映，而知识分子拿这句话来要求党和人民，便也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了。所有在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中接触过这句话而曾经稍对它思考过的人（除了右派分子），都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人们只要想一想许多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地把自己放在人民的中間，把自己当成人民中普通的一員，怎样地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以至于流血牺牲，并把这些同曾经为右派头子罗隆基所宣扬的“士为知己者死”一语所代表的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奇货可居，应当养尊处优，要求党“礼贤下士”、“三顾茅庐”，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思想，对比一下，就不难理解，后者所站的是怎样一种反人民的立场。虽然著者曾指出了旧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心理收买和驱使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他们效劳，但这只表示那时知识分子无可如何的弱点和不幸，而并不接触到“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思想的实质。虽然，在另一个地方（第31——32页），著者批判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本身”，但也只限于说它“是一种宗派主义，过去，它曾经使知识分子由于气味相投分裂成许多小宗派”；而说到解放后，则仍然以肯定的口气利用这句话来表达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原文是“他们把党作为‘知己’积极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而仅仅批判它反映了“宗派主义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批判显然是无力的，抓不住要害的，它远不能揭露今天知识分子中“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思想的极端有害的个人主义的、反人民的实质。

从该书的所有以上所谈的缺点和错误中，可以看出，著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右的倾向的。不将这些问题加以澄清，读者就要受到他的有害的影响。其次，还可以看出：著者在著作态度上，还有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这表现在对党的文献中的某些个别结论，党的某些方针政策，脱离历史条件地加以理解，加以套用。



## 我对人民公社两个问题的認識

黃熙良

人民公社运动，开展到9月底为止，才不过两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90%以上，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思想認識要和已变革了的生产关系相适应，跟得上飞跃发展的客观形势，就必须反复認真地学习党中央有关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和指示等文件。最近我下乡参加对人民公社的調查工作，觉得关于人民公社，有两个問題在認識上是需要强調的。这里就想談談个人的体会。

对于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質是社会主义的，但具有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个問題，如果没有足够的認識，会产生錯誤。例如有些同志認為：“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残余，是集体所有制的任务，看不到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因素”。无疑的，农民把过去爭生爭死，现在成了拖累的自留地变为公社集体經營，把私有的小片的林木果树无偿地归公社所有，那是更加社会主义化的集体所有制。但是，由于这种集体所有制的范围的扩大，公社有的大至一县一社的（如番禺县），这就有利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且随着这种私有制残余的消灭，还会导致生活的集体化，这样的向“公”发展，符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因而也就帶有共产主义的萌芽。看不到这些，就要犯右傾的錯誤。有些同志在广大农民群众热烈要求轉公社时，在轉社过程中却积极地去宣传“互利”政策，以“互不揩油、公平合理”的原則来处理社員与公社（个人与集体）、农业社与公社（小集体与大集体）的經濟問題，結果非常被动。根本原因就是沒有看到农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人民公社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因素。如果我們用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不要斤斤計較小利，那么許多經濟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認為人民公社把私有制残余消灭並沒有共产主

义因素的同志，是把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神秘化了。其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下还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后者是小私有制过渡到前者的必經的經濟形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不需要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由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那样，經過一番激烈的階級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虽然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建立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不就等于实现了共产主义，但这总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須解决的任务。因此，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截然分开，把前者向后者的过渡神秘化，不承認这种把私有制残余消灭是共产主义因素的看法，是与现实不符的。

反之，如果过份强調了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因素，那也会犯錯誤。例如有些同志認為：“人民公社已經是共产主义了”，說现在要把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修改为：“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共产主义”，如不这样，就是“右傾”等等。这些同志看到了快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景，認識到人民公社將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單位，这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公社并不表示由共产主义初級阶段轉变为共产主义高級阶段。因为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轉变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即：“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工农差別、城乡差別、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资产階級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經不起作用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而这



些条件目前尚不具备，还需我们去创造。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不以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硬把今天的人民公社理解为“共产主义的”，那么，在宣传和处理解转公社的经济问题时，也会发生错误。例如有人提出了“超支户不用还钱、盈余户不再找钱”，和“今年劳动工分一笔勾销”的处理办法，以为这样更“共产”些。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很容易造成群众错觉和思想混乱，以为“共产主义就是打乱拉平”。

对人民公社性质的理解，是领会和掌握有关公社的政策出发点，因此，我们正确地认识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问题，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目前人民公社实行部分生活资料供给制和基本工资加奖励制的分配办法，来代替过去农业社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分配办法。部分生活资料供给制，不管是采取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或部分生活资料供给制，按其本质来说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它突破了“按劳取酬”的范围而实行“各取所需”。而工资制和劳动奖励，则仍是根据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态度、劳动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来评定和奖励的，它体现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仍然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残余。由于部分生活资料供给制只占全部生活资料分

配的一小部分，因而它还只能当作人民公社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来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萌芽的东西变成事物的主导方面，用逐步“各取所需”来代替“按劳付酬”。

我们一方面基本上按照“按劳取酬”来宣传和处理解当前公社收入中社员所得部分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新风格和不计报酬、忘我地劳动的新风尚，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如果我们光宣传“多劳多得”，不谈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是将来的事”，以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会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就不对了。由于公社实行了“四包”（伙食、衣服、医病、受教育）等等，所以有一些劳动力强、子女少的人感到“吃亏”、“替人家养子女”。这是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表现，必须加以批判，认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光从共产主义生活的幸福和“吃穿不用愁”来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没有同时认识幸福的生活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因而劳动不积极，甚至以为既然吃穿不用愁，就不愿意劳动，这更是十分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写于番禺县人民公社

## 广州地区高等学校 出版理论刊物

一个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学习理论热潮，已在广州各高等学校形成。各高等学校师生纷纷结合实际问题，写学习心得和研究论文。适应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各校先后创办了许多理论刊物，作为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阵地。华南师范学院师生以系或班为单位，或以联班为单位出版的理论刊物不下数十种之多。例如中文系学生会和团总支联合出版的“理论新兵”（油印月刊），教育系理论研究组主办的“红专”和数学系一年级第五、六、七三班同学联合举

办的“跃进”等，都是在9月下旬或国庆节出版的理论刊物。中山大学也出版了不少理论刊物，如历史系学生办的“红旗手”已出版了三期，中文系四年级乙班也于9月20日出版了综合性的文艺刊物“火箭”，其第一期就是“王季思教授资产阶级学术批判专辑”。这些都是在这次全民学理论的热潮中涌现出来的。此外，广州地区理工方面的专科学校，也出版了理论刊物，如华南工学院就出版了“教育战线”，这是一份全院性的理论刊物，主要发表教工同学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和讨论有关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和教学改革方面的理论文章，该刊准备公开发行。华南农学院的全院性理论刊物，也在积极筹备出版中。

（山）

##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特别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特别欢迎闡明毛澤东同志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学习心得等稿件。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の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要求尽量精簡，一般不超过六千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 理論与实践

月 刊

1958年第10期(总第10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10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本刊代号：46—71

刊号：(穗)0368

印张：2册

定价：每册二角